

# 國際勞工流移之理論取徑\*

Edna Bonacich、成露茜

移民研究正在迅速改變。直至近年，移民研究仍然受人口統計學家主導，專注於指出移民輸出國和接受國各自的「推」、「拉」因素。社會學之關切，往往聚焦於新移民的調適與同化，包括接受國社會對新移民的偏見與歧視問題。研究者對於移民的系統性衡量，往往從功能主義或發展主義的角度，假設遷移能夠平衡資源與勞動力的需求，有利於輸出國與接受國雙方（此類觀點的詳細說明與相關批評，見Bach 1978b；Portes 1978a: 5–11）。

一種新的移民研究取徑現正興起（如Bach 1978a；Breman 1978, 1979；Burawoy 1976；Castells 1975；Castells and Kosack 1973；Freeman 1979；Gonzales and Fernandez 1979；Gorz 1970；History Task Force 1979: 33–63；Maldonado–Denis 1980；Nikolinakos 1975；Omvedt 1980；Petras 1980；Portes 1978a；Ward 1975a, 1975b；Zolberg 1978）。

---

\* 高育慈、鄭諺祺、趙榮輝、顏志翔、鄭惠芬譯，夏曉鵬校對。出處：Bonacich, Edna and Lucie Cheng. 1984. "Introduction: A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eds.),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Pp. 1–5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此派研究者將移出與移入的過程置於更廣的脈絡之中，顯示其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相互關聯的一部分。這種取徑根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其貢獻在於將許多形式的國際遷移視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藉由詳細地研究一個遷移的實例：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期，遷移至美國太平洋沿岸各州與夏威夷的亞洲勞工，本書企圖對此新途徑做出貢獻。我們希望藉此擴展理論觀點，並且闡述亞裔美國人歷史的重要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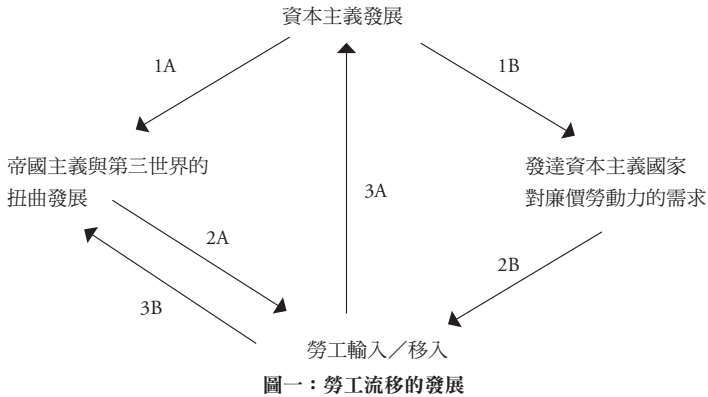
圖一以概念圖顯示本書的核心概念。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帝國主義(1A)，從而扭曲了殖民地的發展。結果使許多人無法再以傳統的經濟活動維生，便有可能移出(2A)。同時，隨著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其對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加，尤其是廉價勞動力(1B)。被殖民人民無法再以傳統經濟活動維生與資本主義經濟對勞工需求增加這兩個條件，均出自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這兩個條件都導致人民被迫以勞工身份遷移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2A、2B)。<sup>1</sup>換言之，遷移並非輸出國社會與接受國社會之間互不相關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二者之間歷史關聯的產物。遷移並非偶然，而是系統性的。

移民勞工(immigrant workers)對於接受國的發展作出貢獻(3A)，而同時其原生國則喪失若干最年輕力壯與高生產力成員(3B)。因此，勞動遷移強化了輸出國社會與接受國社會之間的發展落差。已開發社會因為移民遷移等因素，變得愈來愈發達，而較貧困的社會則很可能持續低度發展。

移民勞工在接受國所受對待不一。雇主視之為工人階級中特別可以剝削的一群，此一立場因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相隨的種族主義而合理

---

1 國際勞工流移(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資本主義國族國家內的進程向海外的延伸，亦即農村的低度發展與城市產業吸收農村人口。資本主義國家先「用盡」自己的小農，然後再往國外尋求更多小農來吸收。



化；本地勞工則懼怕這群特別受剝削的勞工會削價競爭。這些利益衝突引發反移民運動，擴大勞工之間的族群與種族差異，並且導致移民成為一種特殊身份。移民勞工遭工人階級運動的主流排拒，被迫處於類似「內部殖民地」的聚集區(enclaves)。因此，移民勞工所受的待遇，包括其面臨的偏見與歧視，也必須視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

本文作為理論性的導論，探討資本主義的動力，顯示其如何產生前述各種進程。歷史細節必然會影響與牽動各種勢力與進程的發展路徑，但本文並不涉入這些歷史細節。而本書後續章節確實會描述一特定案例的歷史發展：亞洲人移入美國。本篇理論性論文涵蓋三個主題：帝國主義的起源；帝國主義在被宰制國家產生的後果，如何奠定勞工移出基礎；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持續變化的勞力需求如何導致移民。<sup>2</sup>

本文主題相互關聯，一個主題可能在某一情況下為因，在另一情況下為果。可惜寫作是線性過程，必須先闡明一個主題，才能探討下

2 很遺憾，我們未能探討國際勞工流移對於輸出社會的發展或低度發展的影響(圖一箭頭3B)。另有一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美研究中心計畫，正在研究關於從中國移出的議題。

一個主題，這不符合現實相互關聯的性質，卻無法避免。因此在某些討論中，必須請讀者容忍我們將事情簡化，假定其他因素固定不變。我們希望隨著文章進展，還原一些複雜性。儘管我們無法一次交待所有關係，但在論述過程中，我們還是會適時插入圖表(如圖一)呈現部分的交互關聯。

## 帝國主義

從發展馬克思主義或世界體系觀點討論移民的研究者，大多認為帝國主義是將潛在移出者從其母國鬆綁的重要力量。雖然已有學者討論過帝國主義穿透所造成的影響(如Burawoy 1976: 1058；Portes 1978a: 11-23)，但他們卻沒有闡述其肇因。我們認為帝國主義擴張之根源與勞工移民／輸入之根源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若要全面理解後者，就必須先將前者了解透徹。

正如本文其他部分所述，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對於帝國主義根源存在重大爭論，至少對於帝國主義一詞所指涉的對象就無普遍共識(Owen and Sutcliffe 1972: 3；Sutcliffe 1972: 313-15；Arrighi 1978: 9-19)：帝國主義是否涵蓋整個歐洲擴張主義時期，包括十七世紀的貿易公司與早期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時期？還是如列寧(Lenin 1939)所說，應該限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時期？我們無意涉入此辯論，但意欲將資本主義體系向海外擴張的傾向視為統一的現象，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演進，擴張的各階段也彼此迥異。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帝國主義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和週期性的危機傾向。帝國主義可以視為資本(通常受國家支持)緩解此一趨勢的極重要方式。關於資本主義危機，有數個相互對立的重要理

論，不過幾乎所有的理論家都同意，危機來自於利潤率下降，造成資本家減少投資，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如此一路惡性循環。

Weisskopf (1978)<sup>3</sup> 將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危機問題的主要觀點分為三種：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之趨勢；<sup>4</sup> 人口無力消費發達資本主義所有的生產，即消費不足論 (underconsumptionism)；<sup>5</sup> 產業後備軍用盡<sup>6</sup> 之趨勢。雖然沒有必要在對立的理論之間選擇，但我們認為有些理論較能闡明我們的主題。具體而言，產業後備軍用盡理論以及其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之間的關聯，似乎最接近我們所關注的帝國主義議題：在海外尋找廉價勞動力。

3 另見Wright (1975)提出的類似區分，不過其加上第四個理論：國家開支的角色。

4 資本有機構成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這個概念源自馬克思的基本價值公式： $c + v + s = P$ ；其中  $c$  = 不變資本，或機器與原料； $v$  = 可變資本，或投資於勞動之金額，或實質工資； $s$  = 剩餘價值，或利潤來源的額外勞動力； $P$  = 總生產價值。有機資本構成定義為：

$$q = \frac{c}{c + v}$$

即，固定資本所佔投資比例。該理論指出，資本有機構成 (即投資於機器與原料而非勞動力之資本比例) 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呈上升趨勢。假設勞工剝削率不變，利潤率可望下降，因為利潤都源自活勞動的剩餘勞動時間。如果來自活勞動的所有價值的比例均逐漸減少，剩餘價值的比例亦減少。利潤率的定義為： $p = s / (c + v)$ ，即剩餘價值佔總投資比例，可導出  $p = s(1 - q) / v$ ，其中  $s / v$  代表剝削率，即總勞動時間轉化為生產剩餘價值而非勞工工資的比例。剝削率維持不變，利潤率與資本有機構成成反比 (Sweezy 1970: 67-9)。

5 此為資本主義難以擺脫的問題，因為剝削勞工必然導致勞工收入與增長的經濟生產力不相對稱。因此資本主義難免生產過剩，從而導致價格下跌，利潤下降與危機。

6 用盡可以是質與量 (如 Boddy and Crotty 1975; Glyn and Sutcliffe 1971)。以量而言，隨著資本主義積累擴大，吸收愈來愈多的勞工。人口再生無法因應漸增的勞動力需求。勞動力愈來愈不足，實際工資因而上漲，造成活勞動轉換成剩餘價值的比例下壓的趨勢。以質而言，勞工變得愈加有組織，階級鬥爭加劇，同樣地，剩餘價值率或剝削率下跌，利潤率有下壓的趨勢，資本家從而限制投資，因而加速危機。

## 勞動力成本之增加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的勞動力成本(可變資本)往往會增加，其原因至少有五項。<sup>7</sup>這些原因往往對應於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有些較易發生於早期，有些則傾向發生於晚期，不過亦有相當多重疊。

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愈來愈多人由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被拉出而成為無產階級，直到本國潛在勞動力完全被吸收為止。在此過程，我們可以看見自主農業減少，大城市興起，人們從自僱轉為受薪工作。本國潛在勞動力逐漸納入系統，不過因為資本積累的動力持續，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供給。<sup>8</sup>工資隨著資本家爭奪有限的勞工而高漲(Sweezy 1970: 83-7)。

第二個因素是，國家自然資源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枯竭。因此開採或栽種自然資源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例如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開採煤炭所需的勞動，遠少於地表煤炭已採竭的國家(到國外搜尋原料當然也可能只是由於國內沒有資源)。

第三，隨著勞工益趨無產階級化，他們愈來愈無法提供自己與家人生計所需，必須透過工資收入來購買，而僅僅要讓勞工能再生產，工資收入即必須逐步增加。換言之，在勞工尚未完全吸收的過渡階段，勞動人力的生計與再生產的部分成本是由勞工及其家庭承擔，減輕了雇主購買勞工的勞動力的成本。即使在公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過渡時期亦可能尚未結束，尤其是婦女仍然在家工作的

---

7 此上升不一定會影響剩餘價值率(定義為 $s' = s/v$ ，亦稱為剝削率)，必須視勞動生產力而定。如果勞動生產力益增，剩餘價值與實質工資可以同時上升。不過二者並非必然同時上升，實質工資上漲而勞動生產力沒有同時上升，剩餘價值(與利潤)會有所壓縮。

8 前資本主義的小區域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存在，免於完全無產階級化，這些人即使之前從未能取得資本，日後亦可能釋入勞動力之中，現在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即為一例。因此國家潛在儲備勞動力可能在某一時間顯然用盡，卻在另一時間擴張。

話。實質工資上升的指標之一是隨之而來的服務業興起，反映了從家庭提供的無酬服務轉移至資本案提供的付費服務。工資收入必須能夠應付日益增加的付費服務。

第四，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社會條件有利於勞工政治組織，勞工因此能要求分享更多的剩餘。尤其是資本集中於大型工廠，使勞工得以相互比較不滿和建立組織。加上勞工愈來愈無法自行建立生計手段，促使他們要求更多，因為他們已經沒什麼可損失。此外，由於資本主義之發達伴隨著生產力巨幅上升，勞工得以要求分享的「餅」因此更大。所謂適當的生活標準，甚至最低的生活標準，往往會提高。

第五，逐漸增加的勞工需求，可能得到國家有限的支持，諸如失業與老年保險、健康與意外保障、最低工資、加班費、童工法、義務教育、承認獨立工會及其參與集體談判的權利，均支撐了勞動力的價格。貧民福利法規的出現也保護勞工免於競爭之害。換言之，國家幫助確立全國工作與生活標準。

勞動力對資本的成本上升，並不一定代表勞工的處境在一絕對意義上會更好，此應顯而易見。如前所述，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部分原因，是生活費用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增加。生計的成本因為日益依賴商品而上升。儘管工資上升，勞工的生活品質實際上卻可能下降。不過從資本的觀點來看，工資上升而沒有提高勞動生產力為補償，剩餘價值率會下降。馬克思的傑出洞見之一是，工資反映的是勞工的生計成本，而非反映其生產力之所得；生產力與工資互相獨立。無產階級化增加了生計成本，卻不一定會影響生產力，因而得以榨取利潤。

如前所述，勞動成本上升的各種特徵，與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相關。例如完全無產階級化(一些小區域例外)的衝擊，可能是相對較

早發生的現象，而福利國家的保護則與晚期資本主義有關。<sup>9</sup>隨著資本主義從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勞工組織的實力增強，因為在大型工廠集中區，組織的條件大為改善。同樣地，隨著工藝沒落與勞動「降級」(degraded)(Braverman 1974)，勞工組織也從職業工會主義(craft unionism)轉移到產業工會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並且涵括性和戰鬥力也愈高。

因資本主義發展而造成的勞動成本上升，有助於解釋各國工資與生活水準的差異。整體而言，國家愈發展（以生產力而言），其勞動力價格愈高。反之，國家的經濟愈不發達，其勞動力愈便宜。

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殖民地的移民是此趨勢一個有趣的展現。因為他們經常遷移到人口稀疏的居地，通常能夠重建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成為獨立的小農，使他們得以去無產階級化(deproletarianized)。然而他們的勞動力價格傾向於保持高水準，部分原因是以前的生活水準經驗與勞工組織經驗，也因為母國一定程度的保護。因此英國政府才不允許其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堂而皇之奴役來自英國的移民，雖然這些園主可能會想終身控制他們。一旦這些定居者(settlers)擺脫了強制勞動的束縛，土地相對容易取得致使他們的勞動力價格上漲，因為他們可以拒絕低工資的工作。因此，殖民的條件略為更改了上述的趨向，不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利潤下降有類似的效果，原因在於殖民者的高工資水準。

雖然勞動力成本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上升是長期的趨勢，但有幾種逆向的方式，使資本得以阻止利潤率下降。其一是藉由延長工作時間提高剝削率，從而提高資本得以剝奪的生產價值的比例，此策略稱為增加**絕對剩餘價值**(absolute surplus value)。第二種方式是藉由增加

9 即使如此，國家藉由規定工時長度等保護措施，干預勞動標準制定的做法，仍可能發生在極早期階段。不過，國家廣泛的干預倒是僅會出現在資本主義晚期階段。



勞動強度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例如增加速度。第三，資本家可以藉由支付勞工低於生計水準之工資，以降低可變資本(或實質工資)的成本。後兩種方式需要增加**相對剩餘價值**(relative surplus value)(Sweezy 1970: 64-5)。

另一種增加相對剩餘價值的方式，是透過技術創新等方法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亦即資本投資於機器與原料相對於勞動的比例)。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對於剩餘價值率有幾個效應。首先是生產力提升，減低生產一定數量商品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商品價格因而趨於下降，因為商品價值是由活勞動時間而定，商品價值隨必要的勞動時間減低而下降。價格通常會跟著下降，但是如果生產者未面臨競爭，價格可能受人為影響而維持在高檔。因此，即使長遠看來價格會降至真正的價值水準，但在短期內引進技術創新以暫時取得競爭優勢，仍屬合理做法。在過渡期間，資本家繼續以生計成本支付勞工，剩餘價值率因而攀升。

更重要的是，生產力的提高降低商品價格，從而降低勞工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如果生活必需品大致維持穩定，整體經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將降低生活成本，減少可變資本(工資)並且提高剩餘價值率。當然生活必需品的擴增與生產力的增速亦可能相同，在此情況下，資本家從新技術所獲利益便會抵消。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第三個後果是，勞工被機器所取代。機器能「節省勞力」，可能是推動資本家持續改善生產工具的最重要力量，甚至比短期取得競爭優勢更重要。引進機器便可擺脫找麻煩、要求多的勞工，效果非常顯著。這些勞工成立組織，推動罷工，停止生產，並且破壞了資本積累的過程。與此同時，機器增加了留任勞工的生產力，似乎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的理想解決方案。

此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勞力替代的情況，會導致愈來愈多

勞工失業，補充產業後備軍，轉而壓制仍受僱的勞工的工資，因為勞工短缺情況獲得緩解(Sweezy 1970: 87-92)。此時許多人都極欲取代已有工作者的位置，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工人階級近年來已能藉由設立障礙，防止產業後備軍輕易取代自己的位置，因此可以稍微不受影響(Bonacich 1976)。

許多理論家都曾指出，從長遠來看，資本有機構成的持續上升，會導致利潤率下降，其根本原因是，利潤實際上是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而來，因此降低對勞工的依賴終將導致利潤減少。<sup>10</sup>此外，引進機器往往代表勞動人力需要更多教育訓練，此需求是勞動人力再生產成本的一部分，並再次增加了可變資本的成本。受過教育的勞工，其勞動力成本高於未受教育者，因為前者的再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較長。因此，治療勞動成本上漲與利潤率下跌的「藥方」，最終卻加重了原有的疾病。

資本有機構成持續上升還會產生另一個效應：資本的集中。技術創新意味初始投資需要提高，會排擠較小的資本或使其合併，結果致使競爭減少或者所謂**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的出現。巨型公司能夠互相合作、避免致命競爭，是抵擋利潤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壟斷者可以藉由漲價，將工資上漲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從而拉提下跌的利潤，但是生計成本與勞動力價格將因而推升，本國壟斷者也不易在國際競爭。不過在短期內，壟斷者可以藉此維持其利潤率，尤其如果其他經濟部門未出現壟斷，並且無法共謀操縱價格的話。

10 此觀點是基於假設剝削率(或剩餘價值)維持不變，但我們已知此假設不能成立，利潤率所能增加的幅度有實際限制(Wright 1975: 16)。如果所有的剩餘價值均來自活勞動，而活勞動與機器的死勞動的比例下降，則剩餘價值的擴大有其邏輯上限。舉例而言，如果  $c = 5 \cdot v = 5 \cdot s = 5$ ，則  $P = 15$ 。如果我們將  $c$  增至 10，則即使  $v$  因為勞動生產力上升而下降， $s$  還是會有上限。在此情況下， $v + s$  必須等於 5，則  $s$  必須小於 5，即  $s$  必須減少。

總結所有複雜的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基本上應付勞動力成本上漲有兩種策略。一是透過延長工時來提高絕對剩餘價值，此策略可能會遭勞工抵抗，惡化階級鬥爭。二是藉由提升勞動強度或資本有機構成來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第一種情況如前所述，勞工很可能會抵制。第二種解決方案會產生較多相互矛盾的結果，但在其互相抵銷之後，終究無法阻止利潤率下降。

從這些趨向與逆趨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週期性發展的基礎，例如一旦勞動成本上升導致機械化增加，緊接的便是勞工遭解僱或失業率上升。此時「消費不足論」上場，因為失業率上升導致勞工購買力降低，市場規模因而縮小，結果庫存無法消耗，更多的勞工失業，情勢每下愈況。在這些過程也可見復甦的根源。隨著後備軍增加，實質工資下降，剩餘價值率上升。僱用新勞工、增加生產，再度有利可圖。不過復甦發生在機械化程度更高的階段，所以即使短期情勢改善，利潤率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資方與勞方的個別策略可能會改變，前者要防止利潤率下降，而勞工要保護並且改進其生計水準。

因為資本主義無法從內部尋求因應之道，因此被迫向外尋求解決方案。帝國主義擴張是因應利潤率週期性與長期性下降的另一種反應，大體而言，其目的可以視為利用較低度發展社會的廉價勞工。

### 廉價勞動力

較低度發展社會的勞動力成本遠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部分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所致，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影響。我們於此僅討論前者，假設初期發展的差異有助於解釋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繼而成為發展與勞動力成本差異的因素之一。帝國主義的影響將留待第二部分討論。

較低度發展社會勞動力成本較低，主要原因在於其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在前資本主義系統內，人們工作主要是為了自己的生計。當他們受僱於資本家雇主，起初很可能僅將為資方工作視為補充性。他們的生計所需大多是藉由前資本主義形式提供，因此資本家雇主無須支付勞工所有生計所需，只需付給勞工部分當時維持生計的所需。換言之，勞工家庭的生計所需（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可以排除於勞工成本之外。轉型經濟體的雇主因而得以獲取驚人的剩餘價值率，並可透過壓低售價，超越完全僱用無產階級勞動人力的競爭對手。

其他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關的特質，也導致勞動力的低廉。新無產階級可能對工會不熟悉，而且因為他們較不依賴工資收入，所以較無動力去建立或加入組織，以增進其作為工人的長期集體利益。穩定的勞工組織與永久的無產階級化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勞工愈是依賴工資收入，其勞工組織便愈為發達。

較低度發展國家可變資本較低的另一個因素是生活水準較低，可能部分反映了必需品的不同。例如，城市的勞工必須有交通工具才能工作，必須有收音機以獲得某類信息，必須有開罐器因為有些食物是罐頭包裝，必須有冰箱以保存從商店購買的食品……等等；不過生活水準的差異也反映了不同的經驗與期望，亦即馬克思所謂的歷史與道德要素（historical and moral element, Emmanuel 1972: 109–23）。例如，住房標準可能會因社會而異，茅屋或簡陋木屋在某些社會完全可以接受，在其他社會則不符標準。

一般而言，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水準較高，諸如住房、寢具、飲食、各種器具等均較為質優量多，毫無疑問反映了更高的生產力。發達資本主義推出極多商品，其中許多以必需品的名義上市，部分是資本家運作的結果。在貧窮、未開發的國家，這些「必需品」是人們生活有史以來從不需要的奢侈品，帝國主義者可

以利用此較低的期待以降低工資。

### 帝國主義的根源

獲利率的下降趨勢，導致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外擴張的根源。所有型態的帝國主義，均可視為因應利潤率下降趨勢所採取的手段。

我們可以大致依照歷史進程，將帝國主義的擴張區分為四個面 (Barratt-Brown 1972: 25)：一是對外貿易，其重點在於引進廉價商品；二是尋找國外市場以便銷售本國生產的商品；三是尋找廉價原料；四是尋求投資機會。<sup>11</sup>

上述四個面向有一個共同要素：由於其他社會的發展程度較低，勞動力成本較低，所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得以利用這樣的差異，獲取比在本國更大的利潤。往海外發展，因此成為因應利潤率下降趨勢的一種對策。以下讓我們來檢視一下各種型態的帝國主義。

馬克思 (Marx 1959: 232-33) 認為，對外貿易是因應利潤率下降趨勢的一股重要「反作用力」(counter-acting influences)，他指出：「由於對外貿易降低了固定資本，也使可變資本用以交換的某些生活必需品變得便宜，所以利潤率因剩餘價值的提高與固定資本的降低，而得以提高。」換句話說，對外貿易同時降低了原料與部分消費品的成本，因而得以降低工資，利潤因此便提高。這些利益係基於一個概念而成立：對外貿易購入商品的價格，低於本國生產與銷售的商品。

第二個面向所關注的是國外市場的尋求，消費不足論者認為其原動力主要來自於生產過剩，但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外市場提供了一個特別有利的交換機會。馬克思 (Marx 1959: 232) 指出：

11 列寧強調第四個面向並排除其他三個。然而，後文將會說明，這四個面向均化約為一個公分母，彼此難以輕易區分。

投資於國外貿易的資本可以產生較高利潤率，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競爭對象是生產設備較差的其他國家，所以即使商品價格低於競爭國家，發達國家所獲價值仍高於商品本身價值。

馬克思論述的重點在於，發達國家由於機械化程度較高，所以勞工生產力提升，每種商品所需勞動時間減少，生產成本因此下降。但就「落後」經濟體而言，生產相同商品卻需要較多勞動力。因此，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將工業製品銷往較低度發展國家時，其商品價格可低於本地生產商，儘管他們大可把價格訂得比本國市場高。

就第二個狀況而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商品的成本低於落後國家，並利用這種差異獲利。然而，單就進口而言，情況則相反，亦即，海外生產的商品較為便宜。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答案就在交換的商品類別，特別是可變資本在其中的重要性。如果兩國在某項商品的生產上投入比例大約相同的固定資本，則窮國因為勞工成本較低，生產的商品會比較便宜。但若某國特定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高於另一國，則低價的優勢便會流向前者。因此，較發達國家具有出口資本密集商品的優勢，而較貧窮國家出口的則是勞力密集的商品。

這種傾向會促使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至少在初期階段，採取下列的對外貿易模式：發達國家製造的商品以低價銷往落後國家（從而壓抑本地產業的發展），而高度倚賴勞力運用的原料，因為貧窮國家生產成本較低的緣故，所以可能從落後國家出口至發達國家。這種情況不僅是因為勞工成本所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原料匱乏（包括可用土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想要有利可圖，便需提高的資本額及勞動時數。

即使科技已應用於勞動，落後國家勞動的相對低廉仍是優勢。換句話說，在資本有機構成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較廉價的勞動使得未開

發地區能夠壓低售價，與發達經濟體競爭。這正說明電子業等高科技產業，近年為何會出走至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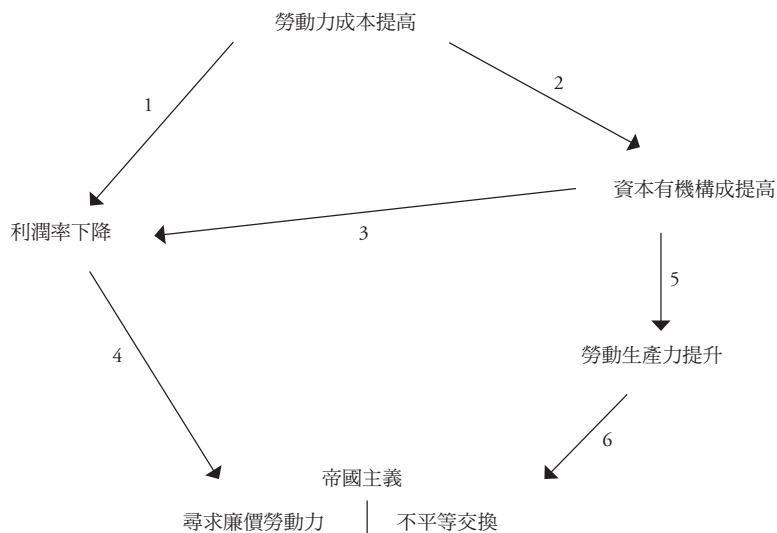
最終，這種交換模式對落後國家仍是不利的。「處於有利條件下的國家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異，這種剩餘，如同勞動與資本間的任何交換一般，是讓某個特定階級給中飽私囊」(Marx 1959: 233)。因此，即使是較高度發展國家與較低度發展國家之間單純的自由貿易，其最終的利益仍歸於前者。於是，完全不意外的情況是：一旦某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取得顯著的領先地位(在採取強制性的重商主義政策而取得的領先)，自由貿易的原則就受到最發達國家資本家階級的支持。這樣的貿易差異是不均衡發展，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趨勢形成的重要原因(Emmanuel 1972)。當然，有了自由貿易的優勢，並不就此免除強制性政策，包括與壟斷地位相關的一切。

原料的尋求是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三個面向。前文已經提及，解決利潤率下降問題的另一種方法，是尋求生產成本或固定資本的降低。較低度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其生產的原料之所以較為低廉，是因為資源開採較少，以及協助取得或栽種原料的勞動力較為廉價。這兩種情況均較可能存在於較低度發展的地區。

最後，第四個面向是投資機會的尋求。有些人從消費不足論的觀點來詮釋，但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一種直接改善利潤率的努力或簡單積累。馬克思(1959: 233)對此做了如下的評論：「考量在殖民地等地區的資本投入……產生較高利潤率的原因相當簡單，即由於發展落後而利潤率較高，且勞動剝削程度同樣較高，因為使用奴隸、苦力等。」換句話說，缺乏發展代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這便表示利潤提高(假定剝削率保持固定)。除此之外，剝削率，或者說剩餘價值率，也可能較高，特別是在殖民地，因此利潤會更形擴大。殖民支配在此顯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我們會在下個章節再予以詳細討論。不過，

即使排除殖民主義的效應，剩餘價值率在未開發經濟體中仍會因為其勞動成本較低而相對較高。因此，即使排除運輸費用或基礎建設發展等複雜因素，高勞動／固定成本比以及高剩餘／必要勞動比的綜合效應之下，在未開發社會的投資非常有利可圖。因此，這些地方成為吸引帝國主義擴張的目標。

圖二總結帝國主義擴張的成因。最直接的動力來自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1)，因而尋求解決方案，在較低度發展地區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來源(4)。因應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次要回應是提高資本有機構成(2)，最終導致利潤率下降(3)，並尋求廉價勞工，增進帝國主義擴張進程。於此同時，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促使勞動生產力上升(5)，商品價格因而下降，並且佔有與低度開發國家貿易的優勢(6)。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帝國主義兩個明顯矛盾的特徵：廉價勞動力與



圖二：帝國主義擴張的成因



廉價產品，兩者均出於同一根源。

帝國主義的擴張並非純然只是一種經濟現象，它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項產品有關，即國家的興起，國家至少部分促進了支配的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因此，帝國主義獲得國家行動以政治併吞與軍事接管等形式的支持。帝國主義強權間的相互競爭往往導致國家介入，因為國家介入可提升強權擴張的速度，有利於削弱競爭者，並保留未來擴張的契機。

帝國主義亦有強烈的意識型態的要素。帝國擴張以「文明化」和「發展」的使命來合理化。非資本主義世界被定義為落後與未開化，以此合理化征服與剝削。因帝國主義興起於西歐，文明與非文明的區隔於是隱含了種族意涵。因此，各種關於種族低劣性的看法便與帝國主義糾葛難分，成為其掌控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合理化論述。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加入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五個面向，即殖民地的尋找，以便讓歐洲過剩的人口可以定居。英國重商主義者支持以人口外移作為因應利潤率下降的對策(Fortes 1978a: 3)。這樣的主張與帝國主義理論強調勞動力成本上升為擴張主因的說法似不相符，但其實並不盡然。重商主義者鼓吹勞力輸出的論點有雙重性質，一是減緩國內過高的失業率，二是可在殖民地以更低廉的價格使用這些輸出的勞工。就前者而言，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本有助於降低薪資，但到達某一程度之後，太過龐大的後備軍反成為國家的過重負擔，且威脅政治動盪。因此，勞力輸出能與需求更低工資同時存在。另一方面，假使來自母國的勞力可限制運用在原料生產方面，且予以約束(如透過契約等)，其工資便可確保較母國低廉。殖民地定居(colonial settlement)因此助長了宗主國(metropolitan nation)的不平等交換與積累。

隨著自由貿易的興起及對移民的限制，這些重商主義政策開始式微。因為西歐工業化一旦全面展開，自由貿易更有利可圖，也更容

易推動，不再需要強制的手段來獲取貿易優勢。同時，隨著產業的成長，勞動過剩情形很快減少，甚至出現短缺現象。在此情況下，最好將本國勞工留在本地勞動市場，以數量抑制工資水準。

歐洲人民移出至殖民地的現象不僅是資本主義政策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歐洲貧民的目標與野心。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是在沒有母國政府的支持下，走避到殖民地，以逃避歐洲情勢。這類的殖民很難稱作是帝國主義。雖然這是資本主義動力的產物，但並非資本積累的驅動力量。

綜合而言，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並同時形成一種循環危機的趨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之一，便是向外擴張或帝國主義。在向外擴張的過程，資本利用較低度發展經濟體的相對低廉的可變資本，以補償下降的利潤。在此我們應注意的是，移民的根源與帝國主義的根源密切相關。二者皆是資本利用或吸收來自較低度發展社會的勞工，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吸收的地點。

## 低度發展

帝國主義扭曲了從屬社會的發展。如果能讓他們以自己的方法進行，其國家發展或許得以繼續，然帝國主義的介入，使其發展被破壞，而常見的結果是變成「低度發展」(underdeveloped)(Dietz 1979；Frank 1967, 1969；Palma 1978)。

帝國主義的滲透以各種不同形式進行，包括直接的殖民支配和外國政治宰制，以及較為間接的外國滲透形式，例如海外投資或不平等貿易協定。這些較不外顯的滲透形式仍可能形成依賴關係，使被支配國家無法決定其自我的發展路徑。在本論文中，我們將會以「被殖民」(colonized)這個詞彙來表示這些被帝國勢力所支配的接受端，不論帝

國勢力是否直接接管其政權。

帝國主義的影響取決於諸多因素，包括宰制社會的發展程度、其殖民政策、世界資本主義強權間的競爭程度、被殖民社會的發展程度、人口密度與氣候等等，但仍能做些歸納。

首先，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初期接觸的階段，經常導致被侵佔地區被迫進貢或財富直接遭到掠奪。這樣的現象以劫掠、要求戰爭賠償或徵稅等等形式出現。不論何種形式，其結果均為被殖民者的部分財富初步移轉至殖民強權的手中。

第二個影響是前文討論過的不平等交換。即使沒有特殊的障礙阻礙自由貿易(例如關稅保護)，不同發達程度的經濟體間的交換會使較發達經濟體獲利。其結果導致本地手工業及剛發展的企業遭受破壞。由於帝國主義強權可以更低廉的價格生產商品，其產品售價便可低於本地生產者的產品。如果沒有外力強迫，本地潛在資本家必然會為了保護自己，而試圖限制外國生產的商品進入本地市場，但由於帝國主義往往與政治支配有一定程度的結合，本地資本家無法保護自己。即使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如被迫開放自由貿易港口，對本地產業也可能是毀滅性的。

此外，帝國主義強權可以積極利用其政治優勢，來破壞被殖民社會的產業發展。他們可以透過選擇性關稅以及其他政策，強迫受支配國家集中從事原料的生產，使得這些國家無法生產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產品。

如前所述，帝國主義擴張的最主要誘因之一，是資本家得以取得更廉價的勞動力，從而榨取更高的剩餘價值率，以因應原宗主國社會(metropolitan societies)中不斷下降的利潤率。然而，取得更廉價勞動力絕非易事。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原住民的政治經濟處於相對簡單的發展階段時(如狩獵與採集，或非定耕農業等)，殖民者難以令這

些「土著」為其工作，而最終將之屠殺或消滅（如Frazier 1957；Harris 1964: 1-24；Marchant 1966），例如巴西印地安人、塔斯馬尼亞人、南非布須曼人、西印度群島的印度人。如果原住民對於征服者毫無用處，他們就會跟野生動物一樣，被迫遠離土地。

然而，即使這些被殖民者過著定耕農業的生活，要讓他們自由地為資本家工作亦非簡單之事。可想像地，原住民與其文化及政治經濟緊密牽繫，不願背離（Portes 1978a: 11-23）。<sup>12</sup>資本家設計各種方法來解決此問題，包括：允許前資本主義方式繼續存在的同時以徵稅或貿易來榨取剩餘；或者以奴役方式強迫人們為資本家工作……等等。大多數的殖民勞動政策則游移其間。舉例而言，殖民者通常會透過改變土地所有制（創造私有財產），或建立現金稅賦制度的方式強迫人至少短期進入現金經濟，來打破原住民的前資本主義方式（Furnivall 1956；Wilson 1972；Amin 1976: 204）。

部分緣於屠殺原住民的結果，部分出於內部勞動供給的困難，殖民情境經常伴隨著從其他已受帝國主義支配的地區引進勞動力。最明顯的例子包括非洲的奴隸貿易、印度的質押工制度（indenture system）以及中國的「苦力」貿易等等。利用其他地區的勞工，使殖民資本家得以切斷與前資本主義模式的牽繫，至少是暫時地。在某些案例中，例如移工，保留與前資本主義模式的牽繫受到鼓勵，以作為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轉至該部門的機制（如 Burawoy 1976；Meillassoux 1972；Wolpe 1972）。就這些例子而言，勞動力價格甚至可以低於純粹奴隸的模式。

勞工的輸入亦與各種不同型態的強制措施有所關連，這些強制措施使勞工受制於資本家。完全發展的資本主義依賴自由的薪資勞工，

---

12 歐洲人也會有類似的不願意，很多人逃到殖民地，是為了想成為自主的生產者，而非屈從為「自由的」薪資勞工。

但這在殖民條件卻使其無法實現。即使勞工可以有效切斷其與前資產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然而，殖民地通常擁有「開放的資源」，廣袤的土地可供新興的無產階級逃離。為了得到勞工，資本家必須將他們綁住(Domar 1970；Evans 1970；Petras 1976: 22)。

上述殖民勞動系統的扭曲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sup>13</sup> 不論雇主採取強制手段、使用移工，或運用半封建式的安排，都缺乏動力將資本主義推向一個更具生產力的系統發展。以莊園奴隸制度為例，莊園主在勞動力的所有權上的投資，限制了他增加相對剩餘價值的彈性。機械化可以減低他對奴隸的依賴，但卻使得他對奴隸投資的價值降低。勞動生產力唯有透過強化勞動或移到更富饒的土地才有增加的可能(Post 1982)。其他的殖民勞動系統亦有類似內在僵化現象。

殖民勞動系統的強制性質，使得另一股經濟發展力量受到壓抑，即階級鬥爭。在殖民支配之下，勞工爭取改善現況的能力受到嚴重的限制，因此，雇主沒有太多誘因去引進節省勞力的手段。少了利潤率下降的威脅，生產工具不太可能持續不斷地變革，結果便是經濟停滯不前。

促成這種停滯的是殖民資本的依賴地位。由於殖民資本(colonial capital)往往依賴對外投資與借貸，利潤與利息必須自被殖民社會中榨

---

13 關於殖民勞動系統是否屬於資本主義的問題，學界有相當多的爭論(Harding 1976)。Frank (1967)、Wallerstein (1974)及其他依賴理論學者均主張殖民勞動系統為資本主義，且自歐洲擴張即已開始，因為這些系統已被整合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但批評者(如Brenner 1977；Fernandez and Ocampo 1974；Laclau 1971)則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生產方式，奠基於特殊的生產關係，而非市場的系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特色是自由薪資勞工的存在，這些薪資勞工無生計工具。由於殖民勞動系統或維持勞工與其生計工具的牽繫，或含有某種程度的強制性(或兩者皆然)，並不符合資本主義的定義。我們自己的立場是，殖民勞動系統無可置疑地是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其目的為資本積累，但其中尚包括了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的成分，因此其發展路線與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盡相同。

取。此外，投資決策考量的是帝國主義資本的需求，內部發展不必然  
是考慮的範圍(如Dos Santos 1970: 231)。

或許更重要的事實是，被殖民社會被迫專事出口。Amin(1976:  
200)指出：

偏重出口活動(外向性)的扭曲現象，是關鍵性的，但並非源自  
「本國市場之匱乏」，而是位居所有場域的核心的優越生產力所造  
成，迫使邊陲侷限於提供產品以供生產的輔助性角色，而其生產  
為其天然優勢：異國農產品與礦產。

偏重出口迫使殖民資本必須進入高度競爭的世界市場，使其沒有  
空間可以控制其商品的價格。<sup>14</sup>

相較之下，宗主國領土(metropolitan territories)的工業資本變成壟  
斷，部分是因為對技術的掌控，部分則由於大規模工業化的成本，需  
要整併成為更龐大的資本。因此，宗主國資本(metropolitan capital)可  
以要求壟斷價格，而殖民資本陷入價格的殊死戰，競爭對象往往是同  
樣從事原料及其他出口品生產的其他殖民地。

殖民地生產的競爭本質形成其勞動系統的特殊性。由於資本缺乏  
控制市場的能力，使得採取強制措施以壓制勞工成了必要手段。奴隸  
主或許偏好自由薪資勞動系統的彈性，但因為其生產的商品的特性，  
而沒有選擇。因此，即使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強制性殖民勞動  
系統仍能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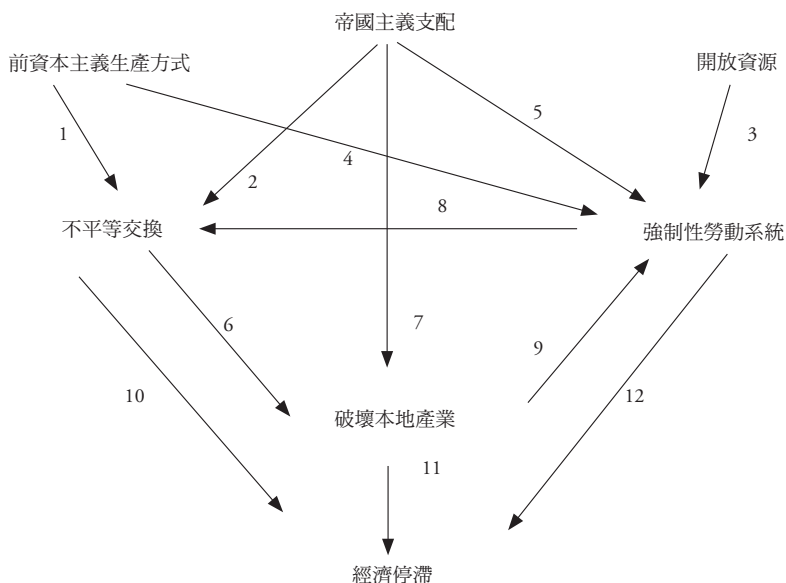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開放資源、原住民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殖

---

14 欲翻轉此一趨勢的著名的例子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因脫離殖民支  
配，紛紛採取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然此一策略最終大多失敗，出口貿易在一九七〇年及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再次主導。

民市場的競爭等殖民情境，扭曲了資本主義發展，儘管這都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物。由於真正的資本生產方式往往不會出現，殖民地發展於是停滯不前。不平等發展情況愈演愈烈，因為宗主國家持續積累，而殖民地成為低度發展。不論被殖民社會多具潛力，其自行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遭受破壞。因此，雖然不平等交換是發展程度差異的直接結果，但帝國主義的支配卻加劇了此一問題。

圖三為幾個主要的發展進程的摘要：殖民與半殖民社會的前資本主義方式，造成了初始的貿易劣勢(1)，帝國主義的支配與強制的自由貿易使劣勢大大加劇(2)。開放資源(3)以及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4)，導致採取強制手段動員勞工，其背後更有著帝國主義政治力量支持(5)，因此便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殖民勞動系統，或稱殖民生產方式，既非一般歐洲所謂的封建型態，亦非資本主義。不平等交換因為



圖三：低度發展的發展

妨礙了本地產業的發展，使得不平等的發展更加嚴重(6)，此過程有外國資本的支持(7)。以強制手段使用勞力的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有助於維持不平等交換(8)，而本地產業的破壞迫使經濟逐漸轉向倚賴廉價、強制勞工的出口導向生產(9)。在此，我們看到一種廉價勞動力、缺乏發展、不平等交換之間的永久循環(6、8、9)。這三者均助長殖民社會處於經濟停滯的狀態(10、11、12)，低度發展的狀態於是形成。

### 階級關係

帝國主義對階級關係的影響，不僅存在於被殖民社會與宗主社會中，還跨越了國家界線。圖四顯示帝國主義造成的主要階級關係。有些學者(如Fanon 1968；Baran and Sweezy 1966)的重點放在國族分界線(national line)，強調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sup>15</sup>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國族壓迫是帝國主義主要的剝削形式，第三世界國家是新的無產階級，而宗主社會整體而言扮演的是資產階級與他們的「跟班」(lackeys)。另一派學者則著重階級關係，強調對勞工的剝削具不分國界的普遍性，以及國際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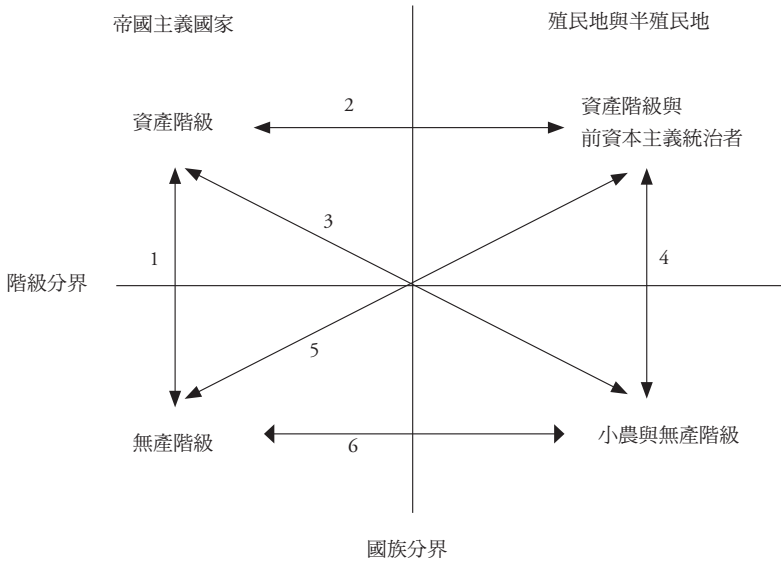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想要完全瞭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就得將國家支配、階級支配，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納入考量。當然，先前已經有眾多學者嘗試過(如Nicolaus 1970；Wolpe 1975)，而本文的目標便是對此種分析做出貢獻。

最根本的殖民剝削，在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殖民勞工(包括小農及其他前資本主義的從屬的階級)之間的關係(圖四，3)。帝國主義資

---

15 這基本上是內部殖民主義學派思維的觀點(見Wolpe 1975)，非馬克思主義的種族關係學者，例如多元社會傳統的論者(如Kuper and Smith 1969；van den Berghe 1967)，也以此為主要立場。





圖四：帝國主義產生的國族與階級關係

本憑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以及種族主義及國族沙文主義意識型態的合理化，行使強制的手段，得以將殖民勞動力的價格壓得非常低。由於還保留前資本主義的形式，因此可能難以看清其剝削的本質。從殖民勞工身上榨取剩餘，但不盡然是以嚴格的薪資關係中產生剩餘價值形式，但即便如此，勞工受剝削的程度(以較鬆散的定義使用，意指勞動價值被掠奪的比例)仍很可能非常高，以致有些學者談論殖民勞工時，會使用**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一詞。

有人主張(如 Bettelheim 1970；Evansohn 1977: 57)殖民勞工受到的剝削低於在宗主社會勞工，因為宗主社會有較高的資本投注於機械，使勞動生產力較高，而資本主義核心的較高的勞動生產力，使資本家得以掠奪更高比例的勞動生產剩餘。但在維持著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殖民情境中，很難測量剝削率。剩餘除了透過薪資關係來掠奪外，還有

許多間接的掠奪管道。例如，一間手工藝品小店利潤率可能很低，勞工看似受到較少的剝削。但該店生產的商品可能經過很多人手處理才抵達最終的販賣，以致直接生產者收入與非生產者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翻了數倍之多。即使殖民勞動力「生產力不佳」，雇用他們還是能獲得很大的利潤。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觀察到剝削程度的差異。<sup>16</sup>

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與殖民地統治階級（圖四，2）之間的關係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如前所述，可能出現的工業資產階級，因廉價產品引進殖民市場而遭受破壞；另一方面，殖民強權已建立了中介的領導者（如買辦階級），或利用傳統統治階級協助他們剝削大眾（4）。這些階級與帝國主義資本結盟，助長階級壓迫而非國家壓迫。然而，這些新興的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和勞工同樣有意推翻帝國主義的支配。<sup>17</sup>

借助中介階級鎮壓與強制勞工，能使得殖民地的廉價勞工變得更加廉價。這類鎮壓可能發生在各個不同層次，小自個別的企業家或地主，大至以高壓政權抑制勞工以利外來資本的國家。這些中介階級時常成為生產關係部分維持在前資本主義狀態的關鍵因素。但是因此流至宗主國資本的利潤變成現代資本的一部分，作為日後投資工業資本主義企業之用。買辦的角色將殖民地小農及勞工置於雙重壓迫之下，使他們更難獲得解放（如 Wallerstein 1975）。

雖然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通常勢力薄弱，和帝國主義與殖民執

---

16 這項議題也有另一種探討方式，就是假定勞動力的價格不受分配給每個勞工來源的資本影響。殖民勞工即使付出同等努力，其所得仍少於宗主國勞工，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宗主國社會勞工在有較大量投資於固定資本的條件下勞動，因此有較高的生產力。假如資本從宗主國勞工轉移到殖民勞工，而後者的薪資與生活水準（至少暫時）不變，則殖民勞工的剝削率將高於宗主國勞工。就是這個差異導致勞工替代（Bonacich 1972, 1975, 1976）。然而，如果沒有額外資本，殖民勞工的確缺乏生產力，產出的盈餘往往不高。

17 不消說，被殖民地區的階級形成遠比此處的簡要描述還要複雜。殖民社會中出現的各種階級，在 Omvedt（1973）有更詳盡的描繪。

政者常有經濟掛勾，但階級中經常有部分人士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要角。他們有志將外資逐出殖民地，不再讓外資削弱他們本身的發展以及國家資源，包括勞工。他們和想擺脫外來支配的農工結盟，換言之，他們一起加入民族解放運動。但是，這樣的聯盟不應掩蓋階級力量運作的事實：對殖民勞工的剝削，以及削弱宗主與殖民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

許多討論聚焦在殖民、半殖民及新殖民社會中需要的是何種結盟，以及誰才是「真正的敵人」，每一種探討取徑，分別連結到某一種對帝國主義影響的分析(如Fernandez and Ocampo 1974；Mandel 1970；Mao 1967: 305-34；Petras 1976；Romagnolo 1975)。其中一個議題是，殖民社會是否需要兩階段革命：先發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殖民主義，使民族資產階級得以資本主義路線發展生產力，並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必要的階段(Omvedt 1973: 7)。共產黨長期以來都抱持這個觀點，遭受不少嚴重的抨擊，尤其是依賴理論家。他們主張殖民地就是資本主義的部分原因是認為小農和工人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不需要再等待經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何況，依賴性資本主義的本質，就已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批評依賴理論者(如Fernandez and Ocampo 1974)，認為殖民地的落後肇因於未完全過渡至資本主義，因此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仍然是必經之路。封建階級關係必須被破壞，例如可透過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直接生產者，以瓦解土地壟斷，這是民主而非嚴格意義下的社會主義政策。只有在封建階級關係破壞後，才有可能進展到社會主義革命。但因為拉丁美洲(應該也包括其他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無法完成過渡的歷史任務，因此端看無產階級。<sup>18</sup>

18 美國的黑人問題有相似的討論(Geschwender 1978: 70-105)。

我們無意加入辯論，這辯論似乎高度爭議性，且常常淪於各個派別將其他派論點斥為背叛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懷疑這種宗派主義的興起，乃因高度壓迫社會中，難以找到可合作同盟和可行策略的緣故。我們的核心觀點很簡單：帝國主義扭曲了被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階級關係。階級對立在面對共同壓迫者時被稍微淡化，至少短期是如此這樣。因此革命鬥爭的軸線往往看來是國族而非階級的。

帝國主義也影響宗主國社會內的階級關係(圖四，1)。如前所述，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大原動力，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帝國主義降低了勞動成本，必定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有重大影響。

同樣的，這種影響的本質也引起一番爭論。有人主張，宗主國勞工獲益於帝國主義。從殖民勞工榨取而來的超額利潤，有部分用來買通宗主國勞工，因此他們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壓迫有牽連。即便國族內部有階級分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分界還是比較符合國族分界，而非階級分界。因此剝削便以國族作為主軸，兩端分為壓迫國與被壓迫(或無產階級)國(如Emmanuel 1970；Nicolaus 1970)。

這個觀點是**勞工貴族**(aristocracy of labor)概念的延伸。勞工貴族一詞原本用於描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內部的某部分，特別像是職業工會會員，他們保護自己不受其他勞工競爭影響，因而使他們的勞動力價格膨脹到超出其實際價值。後來這個概念延伸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所有勞工，因為他們被視為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掠奪當中獲利。

我們不同意這個分析(同樣持此看法的有Barratt-Brown 1972: 79-138；Bettelheim 1970；Dobb 1940: 223-69；Evansohn 1977；以及Mandel 1970，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對宗主國勞工及其階級鬥爭的影響，遠比這個模型所設想的還要複雜。第一，宗主國勞工較多的收入不能單純看作從殖民勞工轉移過來的支薪——「帝國主義的戰利

品」。如本文開頭所述，這大部分是生產能力大量提升或不均衡發展的結果(Evansohn 1977: 57; Bettelheim 1970)。換言之，宗主國社會中較高的工資產自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包括商品價格降低、對商品的依賴增加，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無產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的發展。

帝國主義的主要受益者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不是工人階級。帝國主義幫助資本家階級脫離最可怕的危機，而這危機部分即起因於階級鬥爭。由此看來，這違背宗主國工人階級的長期利益。

帝國主義也助長資本積累，繼而鼓勵將固定資本投資於宗主國社會。這個過程雖能改善生產力，讓宗主國勞動力更有生產力，但也導致勞工因技術發展而失業，再度在宗主國社會中創造出一批產業後備軍。

最後一點，資本外移至殖民地，也造成宗主國社會的工作機會流失。只要資本家在殖民地投資能獲得較多的利潤，他們就不會想在宗主國投資，於是導致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工遭到替代(Barratt-Brown 1972: 104-07)。換言之，兩群勞工被迫彼此競爭(圖四，6)。殖民勞工的廉價便成為優勢，威脅到宗主國勞工的就業機會，以及他們努力爭得的勞動標準。

由於帝國主義的緣故，階級鬥爭無法在國家境內進行。資本的移動性遠高於勞動，因此它不需要留在本地奮鬥到底，而能夠逃之夭夭，徒留勞工面對日漸萎縮的工作機會，無法自保。勞工於是陷入階級鬥爭式微的窘境，被迫與資產階級妥協。通常，與資本妥協的結果是形成企業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或其他溫和的工會主義。這些妥協同樣也以國族分線為界，所以資方和勞方也貌似共享了宗主國社會的利益。與殖民地情況相同，國族的軸線似乎佔支配地位。

同時，宗主國勞工不僅和殖民勞工呈現競爭甚或敵對關係，也和

買辦階級、被殖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圖四, 5)呈現敵對關係。後者不僅協助壓低殖民勞工的價格, 也防止階級鬥爭帶來勞工平等化, 減少彼此間的競爭, 如此便協助鞏固帝國主義的支配, 戕害宗主國勞工。

總而言之, 我們不認為能簡單地說帝國主義已造成從階級剝削到國族壓迫的根本轉變。誠然, 最嚴重的剝削情況發生在帝國主義資本對殖民勞工的壓迫之中, 但其他兩個階級, 宗主國無產階級與殖民地資產階級, 也絕非與自己國家內的其他主要階級利益一致。帝國主義扭曲了這兩種社會中的階級衝突, 導致以國族為主軸的暫時性結盟。但這不表示階級鬥爭不是宗主國與被殖民國要持續面對的嚴重問題, 也不表示國際階級聯盟是不可能或不值得追求的。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之所以薄弱, 主要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活動所致, 而非起因於某群人自然的沙文主義, 或甚至是因為一群勞工為圖己利而犧牲另一群勞工; 相反地, 他們被分化, 使得雙方皆無法成功地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宗主國勞工常常面臨兩難困境, 一方面企圖改善自身相對於資本家的處境, 另一方面又害怕下層的殖民勞工取代他們的位置, 因此, 他們似乎動彈不得, 無法展開真正的革命行動。這點讓一些學者相信, 最具革命精神的階級是殖民勞工, 一反標準的馬克思主義預測: 資本主義必須先到達最發達的階段, 無產階級才有可能進行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

被殖民人民的革命有助於攻擊國際資本家最脆弱的環節。只要殖民勞工有可能推翻帝國主義資本, 他們就會削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自危機中脫逃的能力。所以, 他們終將有利於宗主國社會勞工, 使之能與資本家正面對抗。因此, 如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 1972)多年前針對愛爾蘭的問題所言, 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應該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 勞工移出

帝國主義帶來的低度發展，為勞工移出立下了基礎。如前所述，帝國主義入侵會導致大量的流離失所(Dietz 1979: 18-9; Portes 1978a: 11-23)。本地的手工藝工人因廉價進口製品的競爭，被趕出貿易行列之外；小農不是被迫離開土地，就是擁有的土地愈來愈少；小農家庭為了維持微薄的生計，往往得另外送家人到資本家經營的企業中工作，沒有正職至少也得有兼職。因此，帝國主義造就了一群為求生存存急需就業的人口。

低度發展社會的另一個特色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跟不上農村衰退的速度。城市或資本主義式農業都沒有足夠的職缺。當然，宗主國社會也有同樣的情形，但因為他們的國家是殖民強權使得勞工有一條出路：他們可以逃往殖民地定居，重新建立小農或自主生產者的生活型態。殖民地的人民沒有這樣的出路，因此不管什麼工作他們都得應徵。

某種意義上，殖民勞工的移出可以視為蔓延到海外的移工系統。典型的移出者是一個年輕成年男性，他的家人都住在農村，維持生計農業。他代表整個家庭，到資本主義經濟工作一小段時間，以填補家庭日漸萎靡的生計基礎；同時希望他的積蓄能幫助家庭重建，例如付清債務或是買回失去的土地，屆時他就能回歸家園。所以，這個移出者並不是資本主義部門永久的定居者(settler)，他是個過客(sojourner)，就像是殖民社會中農園工作的人，一年工作一段時間，收割季再返鄉。<sup>19</sup>

殖民勞工移出的暫時性質，從移出者及其家人的觀點來看，完全合乎理性。首先，雖然在資本主義部門能賺取相對較多的財富，但也很容易因為高昂的生活開支而耗盡錢財。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讓單

19 請注意，移出者可以進入宗主國社會或其他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企業。但在殖民勞工移出早期，則是後者居多。

一勞工前去工作，家人則留鄉，多少還能靠生計農業過活。他輔助性的匯款對於身在生計部門的家人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在資本主義經濟下，他們卻只能維持最低等的生活方式。

其次，在農村中保有一塊立足點，可作為一種社會保障(Wilson 1972: 148)。早期的資本主義鮮有照料生病、殘障、年長或失業勞工的保障，而農村社群卻能夠給予他們這種照料。處境不堪時，農村是可歸之處。但為了維持這種社會保障，移出的勞工必須「付出他應付出的」——和農村保持聯繫。聯繫的方法可以是匯款，可能的話，還要不時返鄉探訪。把妻子留在故鄉也是確保聯繫的方式。因此，移民地移出的勞工通常預計要返鄉，並要確保他們返鄉的權利。<sup>20</sup>

有一點我們在此先稍微提及，之後會有更詳細的說明：引進勞工的資本家和移出勞工(emigrant workers)雙方的需求是相當互補且互相強化的。例如，勞工與生計部門保持聯繫，使雇主不必考量家庭生計與社會保障而可支付低工資，而低廉的工資則讓勞工必須和農村保持聯繫。

由於帝國主義涉及不同程度的政治支配，殖民地統治階級常難以控制其移出勞工到海外的工作條件。帝國主義強權可用來脅迫訂定勞工外移的條件。例如，剛被招募可能會被契約束縛數年，使得他們在抵達移入國家後，無法行使權利尋找薪資最好的工作。有時候半殖民地的政府試圖為國民求情，但帝國主義支配削弱了他們的條件，因此他們掌控情況的能力往往受限。

---

20 在本書談到的亞洲移民時期中，單身男性最常見。較近期的勞工流移，尤其是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降，則有愈來愈多舉家遷徙，甚至是女性移民居多的現象。由於這些轉變和本主題不大相關，我們便不在此探究。但即使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單身男性移民的模式還是持續存在(像是墨西哥人移入美國西南部，以及北非人移入西歐)。我們此處描述的現象尚未消失。



勞工移出殖民地的常見形式，是將殖民生產方式的元素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勞工剛到移入地時多半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完全失去生計工具），也不是自由的薪資勞工（能完全自由地為最有利的條件出賣勞力）。他們來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未發展完全的環境，而他們被引進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時，仍未擺脫某些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束縛。我們稍後會再回來檢視移民勞工（immigrant worker）入境時受到哪些限制，但現在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其中有許多限制都是在勞工出境時便已存在。

殖民地招募勞工時，帝國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有時他們派遣代理人積極參與，有時勞工移出大多交由買辦階級或殖民地統治者處理，他們身為中間人，也是維持移出勞工和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重要角色。比如，他們貸款給打算移出的勞工，並簽訂契約要求他們為特定雇主工作以償還貸款。這類案例中含有一種半強制的元素，類似勞役償債制（debt peonage），防止移出勞工變成自由的薪資勞工。

總結而言，帝國主義有助於在殖民地創造一群產業後備軍，可以移至宗主國或其他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部門，成為薪資勞工。但勞工移出的狀況常保留殖民生產方式的特色，也就是不完全資本主義式的，並且帶有強制成分。因此，殖民勞工進入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時，比起其他勞工，顯然處於劣勢。

##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需求

本文開頭提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勞動力價格趨於上漲，造成了週期性且長期的危機。如前所述，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是資本因應危機的一種方法，其手段是找出更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工。若不

將資本移向較廉價的勞工，另一個因應方法就是將廉價勞工移入宗主國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從殖民地移入和輸入廉價勞動力，可以視為一種類似於殖民的現象。兩種情形皆是宗主國資本家為了因應利潤率下滑的趨勢，利用特別受到剝削的勞工群體來提高剝削率。兩者主要的差異，在於剝削發生的場所。

近年西歐「客工」興起，使得許多人以為勞工移入宗主社會只是最近才有的現象。其實，至少就大不列顛而言，這種做法已經歷史悠久，在馬克思與恩格斯(Marx and Engels 1972；亦見Jackson 1963)的年代，愛爾蘭移民勞工已是英國社會的普遍現象。不過，勞工的輸入與移入，在美國、巴西、南非、馬來西亞等殖民社會，比在西歐更常見，因此造成了一些誤解。

基本上，我們可將勞工遷移(labor immigration)區分為三類：由宗主社會移至其殖民地(例如英國工人移到美國或澳洲)、殖民勞工移至其他殖民地(例如印度工人移至納塔爾[Natal]或斐濟群島)、殖民勞工移至宗主國社會(例如西印度群島人或奈及利亞人移到大不列顛)。雖然在三種情形中，移民勞工的相對廉價對資本都是吸引力，但接納國與輸出國社會雙方的發展程度，造成了移民勞工角色的差異。

例如，移民勞工從一個殖民社會移動到另一個殖民社會，他們面對的條件很可能是強制性的。這現象部分是因為移民進入的是殖民地的生產方式，奠基於依賴的資本主義，其資本必須利用受強制的工人以維持營運。各種形式的質押和契約，是殖民地間勞工移動的典型。

工人由宗主國移動到殖民社會的情形則較為模糊。這類移動所創造出的「定居白人」(white settler)社會，往往急速成長為發展中或已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早期階段中，這類移動可能具有強制性質，但隨著接納國的發展，便轉化為自由勞工遷移。工人有可能被大量吸收，因為這些社會是殖民地，尚未發展完全。通常，殖民地有足夠的

土地可用(因為已從原住民手中奪得),也有充裕的自然資源,供新資本剝削,繼而需要勞動供給。

勞工遷移的新文獻大多集中探討第三種移動,即殖民勞工移至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我們剛開始本次計畫時,曾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亞洲人移入美國屬於此種模式,但進一步檢驗證實,發現情況較模糊,實為介於殖民地間遷移與移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兩類之間。問題在於,隨著歷史演變,美國的地位已從殖民地轉移到發達資本主義。即使形式上美國已成功從大不列顛獨立,某些經濟部門仍仰賴大不列顛,至少南北戰爭以前是如此。因此,十九世紀末葉移入美國東北部的歐洲工人進入一個資本主義系統的同時,建立在半強制黑人佃農之上的殖民地勞動系統,則在南方發展成熟。但在亞洲工人移入加州與夏威夷的案例中,這些地區的確切地位難以確定。

美國案例的特徵及其持續改變的發展模式,會在本書第一部分詳細探討。在此,我們將焦點放在殖民勞工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純粹」狀況。本節的目的在於思考: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資本家為何希望勞工從殖民社會移入。我們雖然專注討論這種純粹類型,但也不能忘記這些原則對美國這類過渡或中間案例的適用性。

宏觀而言,我們可將勞工移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視為吸收新勞動力來源的過程。此一過程為產業後備軍注入新血,補充人力,而非回收既有系統中的工人。從第三世界國家移入小農(以及其他前資本主義勞工),可以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吸收自身小農過程的延伸。漸漸地,所有本土小農都被迫離開土地,於是尋求並吸收新勞工的行動便拓展到海外。低度發展社會的小農受到鼓勵、引誘或強制,進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軌道。<sup>21</sup> 小農一進入,便成為廉價勞動力的新來源。

21 在美國西部與夏威夷的案例中,前資本主義形式並未在亞洲人開始移入時完全瓦解。事實上,移入的原動力有一部分即來自資本家無法將本地工人從前資本主義形式中鬆綁。

## 移民勞動力的廉價性

如前所述，來自殖民地國家的移居者，由於母國的發展程度較低，加上帝國主義的影響，而身繫某些桎梏。他們往往一貧如洗，因此願意接受發達國家勞工無法接受的條件。他們常與前資本主義系統有所牽繫，並且多數是健康狀態與工作能力處於巔峰的單身男子。他們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意味著他們習慣於相對較低的生活標準，而且鮮少或不曾接觸工會等無產階級組織。此外，他們計畫回到小農經濟，因此參與移入國當地無產階級運動的意願有限。移民渴望盡快賺錢，因此很可能抗議低工資，但是這種抗議通常採取自發的、短期的形式，而非長時間的抗爭，這是因為移民與本地勞工不同，他們並沒有興趣替未來的世代改善工作環境(Castells 1975: 53)。移民勞工的這些特性，都促使他們落腳之後成為廉價勞工。<sup>22</sup>

移入國的工作條件使移民的劣勢加劇，也使其特殊處境永久延續。移入過程本身就助長了移民勞工的廉價性。新來的移民面對各種適應問題，包括語言不通，以及不熟悉如何尋找住處、如何在社會中活動等。在這些壓力條件下，移民可能被迫接受不理想的低薪工作，至少在安頓下來以前必須如此。如果移民勞工不懂本地語言，便很難謀取與能力相稱的工作，如此一來安頓過程可能相當漫長。

另一件遠比適應問題更重要的事，或者說比任何移民從母國帶來的劣勢都要重要的事，就是「移入」(immigration)本身允許接納國將這些工人置於特殊的法律分類之下，他們得以遭受不同於本國國民的待

---

此狀況與本文敘述的狀況有一隱含的共通點，亦即在這兩個案例中，僱用本地勞工都太昂貴，對獲利能力產生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僱用移民即可能較有利。

22 實際上，移民落腳時具備這些特性的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原居社會受殖民程度愈高，這些特性就愈可能顯現。因此，這些特性見於第三世界移民多過歐洲移民，東歐移民又多過西歐移民。

遇(Castells 1975: 53; Petras 1980: 440-45)。這不只深刻影響移民勞工起初的廉價，也深刻影響接納國社會使移民勞工更長期地維持廉價的能力。照理說，不管一個人起初的生活標準多低，進入一個生活標準較高的國家以後，期望值應該會迅速重新調整。然而，移民的法律分類，使接納社會的資本家得以干涉此一過程，延長移民的廉價勞工地位。

接納國的資產階級發揮影響力壓制移民勞工，主要方法有三，三種都涉及至少一定程度的國家介入。第一，國家可以選擇誰能進入。舉例而言，移民法可以挑選身強體健的年輕男人，排除所有依賴人口，諸如婦女、兒童、老人、病人及貧民等。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可以留給輸出國負擔(Burawoy 1976; Castells 1975: 47; Gorz 1970: 29)。同時，移民勞工的維護(maintenance)得以壓到最低。於是，由於移民勞工比一般工人健康，醫療成本也可能減到最少(Castells 1975: 46)；當移民勞工不得攜帶家眷，則可被安置在工寮、伙房或其他低於標準的房舍中，且不需提供教育設施……等等。總而言之，完整人口所需的正常社會成本，例如住房、教育與醫療等，在移民身上都有可能減至最少。

第二，資本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把移民勞工放在特殊的法律分類中。非公民的身份，使最輕微的挑釁行為，都可能導致遣送回國的命運。在此基礎上，他們可以被拒取得福利及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險，而一旦他們不再具備生產力(原因可能是個人傷殘或者經濟衰退)，就有可能遭到遣返。再者，倘若他們顯露出一絲政治危險性，也有可能被解僱，這明顯抑制了他們參與公開抗議活動的意願(如Castells 1975: 53; Portes 1978a: 1-33)。

移民特殊法律地位的存在創造了法外地位的可能性，即非法移民。所有移民勞工的不利條件，對於非法移民而言更是嚴重數倍，非

法移民如果試圖參加抗議活動或以任何方法改善自身處境，馬上就有曝光並招致遣返的危險（如Portes 1978b；Samora 1971）。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一種，就是移民輸入國社會的資本家可以主動參與招募過程。如此，他們便能趁工人還在母國時簽下合約，納入控制。此時工人可能不會察覺，合約條款相較於移入國其他工人的工作條件，其實非常不利。然而落腳之後，他們如欲毀約，便會受到訴訟的威脅。

Castells (1975: 52) 總結了資本可以對移民勞工行使的特殊支配：

移民勞工對資本的用處主要來自於資本得以彷彿勞工運動不存在的方式對待，這使得階級鬥爭倒退數十年。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搭配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這就是壟斷資本家為了克服自身危機所做的夢。

另可補充一點：移入條件使得資本能夠將非市場因素納入工資決策中。移民勞工不是完全自由的薪資勞工，但他們的自由程度會隨時間和地點改變。換句話說，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特性與移民勞工的地位有連帶關係，也限制了工人的選擇，以及他們完全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能力。殖民地的生產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複製到了宗主社會之中。

基於種種不利條件，移民勞工與其他工人相比，工作條件可能格外嚴苛，包括工時較長、工資較低、生活條件較差、勞動強度更高、工作環境更危險……等等。他們做的是社會上的「骯髒工作」（Oppenheimer 1974）。在某一相同程度資本投資下，移民勞工的剝削率高於本地工人的剝削率，平均利潤率因而增加，使資本得以緩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移民小資產階級成員在移民勞工處境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和殖民地統治階級一樣，與宗主國資本存在雙重關係。一方面，雙方可能互相衝突、競爭，因為他們發展成資本家的能力受到不平等交換與法律／政治限制的阻礙。另一方面，他們可能大力助長本地資本持續壓制移民勞工，同時也為自己謀取利益。

移民小資產階級扮演中間人的例子之一是勞動承包商，擔任此職務者往往是移民社群的成員。勞動承包商可能有兩種面貌。他可以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試圖為工人達成最有利的協議，同時增加自己的佣金或收入。他也可以藉由承擔招工成本、供給工人住處與食物、在淡季時幫他們尋找替代工作，為雇主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這些節省成本的功能之外，他和他的工人之間也可能保有前資本主義的牽繫，例如其關係可能是家族的、同村或同鄉的。這些要素反映了相互責任的紐帶，使得工人難以與承包商發展出對立關係，使承包商有不尋常的權力能控制旗下的勞動人力，使主要雇主獲利。這些牽繫也能阻礙不同工人群體攜手合作，尤其是國族背景不同的群體，因為他們的承包商都是小資產階級，彼此存在競爭關係。

移民中間人的角色也延伸到其他小型企業形式(Bonacich 1978, 1979a)。舉例而言，即使是獨立服務業或零售商店經營者，也能發揮勞動控制的功能。他使用無酬的家庭勞工，就是將前資本主義關係延伸到資本主義環境中的最佳範例。但即使僱用的是薪資工人，前資本主義元素也很可能以同宗、同鄉等家父長式的關係形式出現。廉價的移民小商店對大資本而言或許沒有直接益處，但卻讓本地資產階級能夠與移民社群進行降低成本的交換。總而言之，宗主國資本家與移民小資產階級皆是移民勞工持續處於極度剝削地位的因素。

## 部門的集中化

移民勞工並不是平均分佈在他們移入的經濟體之中。他們傾向集中於某些地域，並且過度集中在某些產業、企業與職業中。移民有幾種明顯特徵可能是這種集中傾向的原因，例如造成地域性集中的地緣關係，或移民勞工技能與職業所需技能的相符程度等，但除此之外，發達資本主義及其對移民勞工分佈的影響，還可做何解釋？

一方面，我們可看見在雙元(dual)或區隔(segmented)勞動市場中，移民集中在競爭激烈的部門(如Portes 1978a: 37-9)。另一方面，他們又很可能被排除在壟斷部門產業之外。<sup>23</sup>此種分隔的原因在於不同部門的勞工需求。壟斷部門企業在技術與機械化上投資較多，因此需要更高度的訓練，最明顯的例子是規劃生產流程的技術專家，但即使是生產線上的工作也需要一定的訓練。壟斷部門企業發展出龐大科層組織，其文書工作人員至少必須識字。因此，一般教育與專業訓練的需求，在壟斷部門中都傾向提高(如Gordon 1972；Aronowitz 1978)。<sup>24</sup>工人的穩定性等議題愈來愈重要，因為生產流程如果運作高度複雜且環環相扣，再培訓的成本將會高得無法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充分發展且切斷一切前資本主義牽繫的永久無產階級，錄用的機會較大。

---

23 雙元或區隔勞動市場理論(如Gordon 1972；Edwards, Reich, and Gordon 1975；O'Connor 1973: 13-39；Victorisz and Harrison 1973)認為產業是分歧或再細分的，視種種特性而定，如資本密度、規模、集中程度、產品不可儲存性，以及市場範圍等。此理論主張，產業的這些特性有助於決定其勞動力需求，以及該產業控制勞工的策略。例如，壟斷部門企業可能設置內部的工作階梯，作為勞動控制的機制。

24 事實上這一點頗有爭議。有些人主張，發達資本主義中備受吹捧的教育需求是一場騙局。我們認為這項議題之所以有些混亂，是因為關注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確，機械化削弱了工匠的個人技能(Braverman 1974)，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特徵。但這個階段一過，工業廠房設置完畢後，複雜性日益增加，此時便需要另一種教育，只是不可諱言地，教育需求的確不是均勻地分布在整個企業之中。



壟斷部門需要的勞動力類型及其工作條件，有利於工人組織的形成。工會容易發展成形，促使工資增加、工作條件改善。換言之，壟斷部門企業容易面臨勞動成本持續上漲的情況。他們因應的方法之一是引進更多節省勞力的手段，進一步增加仍受雇的勞工的生產力，以更低廉的成本生產商品，藉以在同類產品中取得競爭優勢，超越其他企業。或許更重要的一點是，寡佔的地位，讓這些企業壟斷價格，將增加的勞動成本轉移給消費者，從而不讓利益受損。因此，壟斷部門企業能夠應付上漲的勞動力成本，不致遭受嚴重威脅。

相較之下，競爭部門的企業握有資本不多，勞工對資本比率(勞力密集度)高。他們的資本不足以引進大規模的技術革新，因此勞動生產力低。這些企業通常規模較小。由於進入此一部門需要的資本少，其產業集聚(industry of concentration)往往過高。事實上，壟斷部門因為技術革新而解僱勞工，造成產業後備軍增加時，競爭部門的小企業很可能增加，因為某些失業者能夠湊集資本，成立這種低資本企業。於是，競爭資本主義不斷地在社會邊緣再生成。

這些特性決定了競爭部門企業所需的勞動供給性質。生產不穩定，導致企業需要季節性工人與兼職勞工。這些企業在機器上的投資較少，因此維持機器隨時運轉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所以，對於任何勞工的訓練僅有最低程度的投資。勞工的流動相對而言較不重要，甚至可能正如企業所願，因為如此一來勞動成本便可持續壓低(對於新進工人可以只支付起薪，資深工人則可能期待持續加薪)。個別勞工的生產力，在競爭企業裡比在壟斷企業裡要低得多，主因並不在於訓練的差別，而是運用在每一個勞工身上的資本多寡。不同部門的勞工，就個人特質而言，事實上可能是可互換的，但是工作本身創造了相當不同的生產力。

發達資本主義不同部門需要的勞工各異，這對移民勞工的集中分

佈造成重大影響。所有資本家都希望降低生產成本，但競爭部門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更為迫切(如Castells 1975: 58)。因此許多論者預測，移民會集中在競爭部門企業與產業，並且集中在以此類企業為主的地區。

區隔勞動市場觀點，對於瞭解目前移民勞工的集中分佈或許有用，但我們質疑其普遍性。勞動市場區隔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現象，其興起有一部分是在回應新出現的勞工保護法規(Bonacich 1980)。如果考慮更早的勞動力移動，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數百萬南歐與東歐人移至美國的例子，我們會發現工人並非集中在外圍的小型企業，而是當時最大型、最發達的產業。事實上，他們的勞動促使這些企業轉型成為壟斷巨頭。因為本書探討的亞洲移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現象，所以我們對於移民勞工的集中分佈有必要進行更廣泛的瞭解。

我們從這個原理開始：所有產業與企業都希望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而勞動力成本降低是生產成本降低的根本要素。生產成本可以藉由直接僱用較低工資勞工來減少。向僱用廉價勞工的企業購買原料或資本財，也可以間接減少生產成本。若有以廉價勞工為主的企業提供廉價消費品或服務，則雇主或消費者可將之轉化為較低的工資，同樣可以減少生產成本。

用另一個方式說，即使資本家未直接僱用廉價勞工，廉價勞工的存在依然對資本家有利。壟斷部門企業與仰賴廉價勞工的企業的關係就如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企業的關係。剩餘可透過前文探討過的機制從後者流向前者：不平等交換(基於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減少輸入成本、單純的剩餘掠奪(例如租賃與利息支付)，以及依賴關係(例如分包，或者其他壟斷資本能夠主導生產過程的情況)。因此，廉價移民勞動力的存在，即使集中在特定的產業部門與區域，其影響也很可能遍

及整個經濟體。

所有企業與產業都能受益於廉價移民勞動力的使用，但至少要有兩項因素影響他們僱用的需求與能力。第一，各企業與產業中，工人組織化以避免僱用移民勞工的程度不一。本地勞工在某些情況下獲得國家支持，可能阻止資本家僱用移民勞工來削弱他們（此議題在底下「階級關係」一節中會更深入討論）。

無法利用移民勞動力的產業類型，因歷史時期與經濟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例如，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通常由小型商店僱用的工匠，就屬於最有組織的勞工。因此，工藝幾乎不可能僱用廉價移民勞工，廉價移民勞工傾向集中在非技術性職業，通常是在有能力去技術化（或將複雜技術分解為僅需少量訓練的基本組件動作）的大型工廠。相對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型工廠的工會較能阻止雇主使用廉價移民勞動力，今日的雙元勞動市場便反映了這個後期階段。得助於國家制定勞工保護規章，規範大規模企業中的勞動標準（Bonacich 1980）。是故，移民在現代較可能集中在小規模企業，因為小企業能夠規避工會的組成，迴避國家檢查。

雇主使用廉價勞動力，可能是一項持續抗爭與改變的議題。暫時適應於高價勞動供給的時期過後，雇主可能會重新開始努力降低可變資本的成本。我們預估，這關乎週期性波動對利潤率的威脅，或者對壟斷地位的威脅（例如國際競爭的激烈化）。因此，某個時間點沒有僱用移民勞工的企業，可能會在另一個時間點試圖引進移民勞工。也就是說，移民的產業分佈是一種可變的現象，取決於勞方將移民阻絕在外的決心，以及資方引進移工的決心（或立即需求）。

上述結論將我們帶入第二個影響移民集中分佈傾向的因素，也就是不同產業直接僱用廉價勞工的立即需求。企業的經營自由程度受許多因素影響：對資本來源的控制、控制市場的能力……等等。一般而

言，壟斷部門企業較能控制其環境，也較無僱用廉價勞動力的急迫必要。即使僱用移民勞工，也比較能夠優待他(Castells 1975: 58)。

我們希望用「依賴」而非「競爭」一詞形容無法控制資本與市場的產業。雙元勞動市場文獻中描述的競爭部門，暗示著小規模邊緣企業通常導向本地市場。而依賴性企業不一定是小規模或本地的(雖然也可能是)，甚至不需要參與高度競爭的市場。舉例而言，美國南方的奴隸莊園，規模通常很大，且產品銷往全國與國際市場。然而，他們的經營受限於外來投資的約束，以及一個無法控制價格結構的市場，而競爭並不一定是缺乏控制力的原因。因此大致上，我們預估廉價移民勞工很可能較集中在相對處於依賴地位的產業與企業。

移民勞工集中在特定產業，對該產業的發展是有影響的，特別是在移民勞工受到特殊政治限制的時候。只要前資本主義(強制的、半強制的，或者家父長式的)關係繼續盛行於這些產業，他們就幾乎沒有機械化的動力。於是便產生以下的循環：需要廉價勞動力——機械化失敗——需要廉價勞動力。產業停滯不前，而困在該部門中的工人，提升的機會也受到限制。換言之，前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型勞動系統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集中分布，造成了不平等發展(Bluestone 1972；Victorisz and Harrison 1973)，某些部門愈來愈落後。

不平等發展轉而使發達部門得以利用落後部門。這是一種生產方式的構聯(articulation)——壟斷資本能夠利用存在於同一國家境內的前資本主義方式。引進廉價移民勞工，便是如此在內部複製了宗主國資本與殖民勞工的關係。<sup>25</sup>同樣地，使用被殖民的廉價勞動力，正是資本用以迴避危機與利潤率下滑的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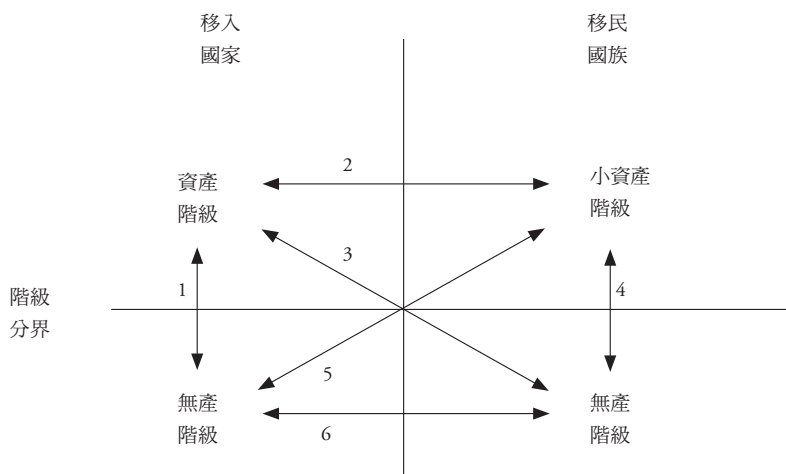
---

25 或許有人會說移民勞工形成了一種「內部殖民地」(如Blauner 1974)。內部殖民主義模型的確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我們並不特別執著於此模型，部分原因是它傾向強調國族壓迫，不利於檢驗國族壓迫之下暗藏的階級力量。

總之，所有資本家，不管壟斷程度高低，都會盡可能尋求最廉價的勞動供給，這可說是一條定律。但是依賴性企業面臨的壓力，很可能比壟斷企業更巨大也更持續。前者向外尋求新的勞動力來源，較不受內部員工與國家的約束。事實上，國家在壟斷資本家支持下，還可能主動協助依賴性企業尋找新來源。因此我們預期，移民勞工會比較集中在依賴性企業。而且，只要壟斷部門企業能夠自由使用廉價移民勞動力，他們就會使用，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

### 階級關係

圖五顯示移民勞工周圍的主要階級關係。明顯可以看出，此圖與圖四互相對應，這是刻意的。我們認為來自被殖民國家的移民現在雖然身處宗主國土地，但實質上仍是複製帝國主義的階級關係。當然，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誇大此一對應關係，因為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若干重大差異。



圖五：勞工遷移導致的國族與階級關係

前文我們已經討論過箭頭一至箭頭四。勞動力價格上漲，尤其是階級鬥爭(1)引起的上漲，驅使宗主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去尋找更廉價的移民勞動力(3)，尤其是透過特殊控制手段，甚至是直接脅迫。移民小資產階級在此可能擔任重要角色，協助控制移民勞工(4)，使本地資本案(2)從中受益。

引進移民勞工對本地勞工階級造成潛在威脅(6)。如前所述，本地資本利用移民勞動力壓低勞動成本，降低勞動標準，這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如Gorz 1970: 28-9)。資產階級對待移民勞工時可以當作勞工運動不存在，工運成員因而遭受威脅。

威脅有直接與間接兩種。<sup>26</sup>直接威脅是資本家利用移民破壞罷工或取代本地勞工。雇主可能拿移民當成棒子，脅迫本地勞工降低要求，否則就直接解僱本地勞工(Castells 1975: 59)。直接替代的問題，經常促使本地勞工團結自保。常見本地勞工發展出種種機制，阻止雇主僱用移民直接替代或其他方式，以免遭到削價競爭。壟斷部門勞工最有組織，因此最能保護自己免受移民競爭，這種保護主義迫使移民必須轉而尋找依賴型企業裡的工作。此外，移民由於機會有限，地位因此受到進一步削弱，從而加劇其勞動力廉價的情況。

移民若受雇於勞工運動尚未成熟的部門，則不會對本地勞工構成直接競爭，此時形成的便是間接威脅。有些論者(例如持內部殖民主義觀點者)認為，區隔的產業僱用移民，有益於本地勞工，因為雇主從移民身上榨取的剩餘，可以部分轉移至壟斷部門的勞工身上。顯然地，這種論述呼應國際勞工貴族的概念，以及宗主國勞工受益於帝國主義的說法。在此請容我們從本地勞工的角度，簡單重述我們對於此一論述的回應。壟斷部門的勞工之所以享有高薪和較好的工作條件，部分

26 Bonacich的分割勞動市場(split labor market)研究曾細究過此議題(Bonacich 1972, 1975, 1976, 1979b)，本論文不再贅述。

是因為壟斷部門的生產力普遍較高，而這點又可歸功於生產能力的發展，以及壟斷部門勞工發動的階級鬥爭，並不單純是從依賴部門掠奪而來的結果(Gorz 1970)。移民和依賴部門的勞工薪水更微薄、工作條件更繁苛，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產生的利益除了流向壟斷資本家，加上少部分流向依賴資本家以外，很難說還流向其他人。

廉價勞動部門的存在，即使是隔離在依賴產業之中，對於整體勞工運動而言仍是威脅，它阻礙整體勞工薪資的調升，本地勞工也因為感受到被替代的威脅，而向資本妥協。換句話說，資本得以取得廉價勞動力，即使是間接地，都阻礙發展階級鬥爭、推翻資本；移民勞動力的存在，由此阻礙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以廉價勞動力為主的產業對資本家極具吸引力，因為資本家可利用廉價勞工賺取更高利潤。受此驅使，資本家將資本從工會組織完備的工廠和地區，移轉至可取得廉價勞動力的地區。現有工廠的勞工雖然未被直接取代，卻會因為資本流動而被間接取代，最後結果便是在國內遷廠(或工廠出走至勞工廉價的地區)。

最後，如前所述，廉價移民勞動力的存在，也是依賴型企業不願改善生產工具的主因。這些企業內的半強制的前資本主義關係，使剩餘價值率並不會立即受到威脅，資本家便缺乏動力引進節省勞力的手段，從而同時改善工作條件、提高生產力，結果導致這些產業的發展停滯不前。因為從公認的勞動標準來看，這些產業提供的工作機會一點也不誘人，所以工作本身就「遭到替代」。

Castells(1975: 54)清楚說明此點。他指出常有人主張移民勞工是必要的，理由是本地人不願從事某些類型的工作，他說道：

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雖然移民從事的確實是最辛苦、薪水最差、技術層級最低的工作，但這並不代表其他勞工明知這些工作

有存在必要卻不願從事。勞工不願從事，並非因為這些工作「骯髒」且「枯燥乏味」（因為他們轉而從事的工作也很難說得上是「能實現抱負」的），而是因為這些工作的薪資比較微薄。辛苦的工作只要薪資相對較高（例如礦工），就有人樂於從事，尤其是本國人。誠然，這些工作低薪又最辛苦，但這是相對何種標準而言？標準在於各國經由工運達到權力平衡的歷史標準，是有力量爭取較好工作條件和較高工資的工人階級無法接受的條件。因此簡單地說，移民勞工並非因為有「辛苦而低薪的」工作而存在，反而應該說，辛苦而低薪的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移民勞可供差遣從事這種工作（粗體為 Castells 所加）。

當然，如果這些工作真的有所改善，平均利潤率勢必降低，資本將無法因應即將到來的危機（Gorz 1970: 31）。

在本地工人階級中，有一個群體特別容易因為資方競爭性的使用移民勞動力而受害，即本地的產業後備軍。移民勞工和本地產業後備軍都很難獲得壟斷部門的工作，因此會在某個程度上相互競爭有限的選擇：社會福利、小型創業和依賴部門的就業機會。這些機會本身已經供不應求，競爭人數增加時，機會更會進一步壓縮。此外，由於移民較難獲得福利津貼和其他補貼（有時也較缺乏爭取的動力），所以對照之下，本國的後備軍的形象便成為不願工作的社會負擔。

本地勞工對移民的保護主義反應並非無可避免。他們可以（有時也真的會）將移民充分吸收至勞工運動之中，從而打擊資本利用移民勞工分化工人階級的意圖。遵循此一辦法，顯然有助本地勞工的長遠利益，但他們往往不這麼做，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們是被收買的勞工貴族，倒不如說將移民納入工運可能極其困難。移民和本勞之間交織著三層壓迫。第一，移民本身的前資本主義牽繫，尤其是對母國社區的



牽繫，阻礙他們加入本地勞工陣營。第二，移民小資產階級可能控制移工，使其無法與本地人交融，這是對立關係沿此軸線形成的基礎(圖五，5)。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資本和國家可將移民勞工納入一個特別脆弱的分類，導致他們參加勞工運動時，必須面臨比本地勞工更大的風險。值此之故，移民勞工的客觀條件不同於本地勞工，這使得雙方調和有其困難。

本勞的保護主義反應使分化加劇，導致移民勞工向母國政府、本地民族小資產階級，甚至本地資產階級求援。後兩種情況有時可能導致家父長式保護措施的出現，因為這兩階級的雇主很樂意充分利用這些移民，同時又讓他們溫順聽話。無論訴諸何種援助，移民勞工與本地勞工運動之間的分化都會進一步加深，而工人階級之間的國族分界也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深溝(見Bonacich 1976，以美國黑人勞工的情況說明此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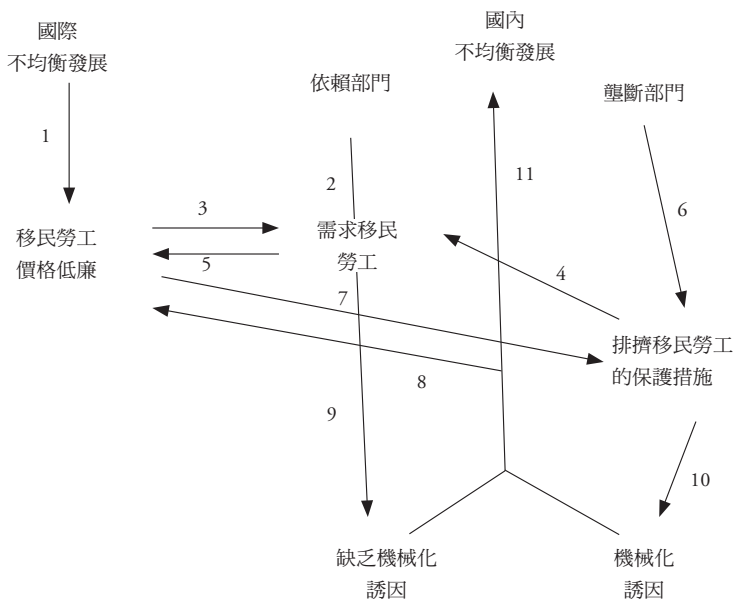
本地勞工的歧視，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讓移民小資產階級有機可趁。移民勞工由於找不到壟斷部門的工作，往往被迫為自己社群裡的雇主提供服務。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這些工人必須接受雇主開出的任何條件，因此，移民企業的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可能特別惡劣，俾使其維持與其他企業的競爭地位。

圖六概要說明國內與國際不平等發展的相互影響，以及移民勞工在發達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一開始是國際不均衡發展及其創造的廉價勞動力來源(1)。由於接納國內部的國家不均衡發展，導致移民勞工的需求出現在依賴部門(2)，移工往往在此就業(3)。經濟和政治限制壟斷部門企業直接聘僱廉價移民勞工，助長依賴部門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4)；但在此同時，壟斷部門企業也需要廉價勞工進入系統，以挽救持續下滑的利潤率。移民勞工集中於依賴產業的情況(以及迫使其留在依賴產業的特殊政治障礙)，是移民勞工持續為廉價勞工的重要因

素(5)。

而在壟斷部門，因為前述種種原因，工人階級已經能保護自己免遭直接替代(6)。由於移民勞工是特別廉價的勞力庫，因此壟斷部門的工人可能會建立保護壁壘，使移民勞工無法獲得該部門的就業機會(7)。保護主義驅使移民勞工進入依賴部門，從而有助於維持其廉價勞工的地位(8)。

依賴企業可以利用廉價勞工維持高剝削率，故而缺乏機械化的誘因(9)，壟斷部門卻恰恰相反(10)，需要持續投入更多資金來改善生產工具，增加勞動力的生產力。不均衡的發展情況因此不斷延續與再製(11)。



圖六：移民勞工與不均衡發展

## 移民政治運動

移民勞工是工人階級中最受壓迫的一群，有條件使他們起而組織政治運動，發出抗議之聲。他們的處境類似殖民勞工：兩者皆處於剝削鏈的最底層，一旦全面推翻這體系，他們將獲益最多而失去最少。

然而，這股壓迫卻也同時阻礙了移民勞工的鬥爭，他們遭遇的障礙有：第一，移民勞工是移動的勞動力，組成份子不斷改變，使組織工作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壟斷部門勞工擁有穩定的勞動人力，新人僅佔少數，很容易吸收至工運陣營，反觀移民勞工組織面對的卻是超高流動率。此外，移民勞工與母國前資本主義村莊間的聯繫，也使問題更為惡化，因為勞工一旦不滿工作條件，大可從勞動市場抽身而出。

第二，移民勞工身處競爭激烈的依賴產業，參與的是競爭最激烈的勞動市場。不同於壟斷產業的勞工，依賴部門的勞工不斷互相競爭，僅僅為了保住飯碗和一份僅供餬口的薪水。在依賴部門組織工會普遍要困難許多，無論勞工是否為移民皆然。再加上移民被迫聚集在此，問題便因勞動人力組成的異質性而加劇。工人團結籌組工會的努力，因語言和文化障礙而平添許多困難。

針對移工施行的前資本主義或非市場管制措施，是移民政治運動的第三重障礙。施行這些前資本主義管制措施的，可能是移民小資產階級，也可能是本地統治階級，無論何者，都會使得移民無法成為自由的行動者，從而組織政治運動。

第四，移民與本地工人階級之間缺乏協調，是移民成立組織的另一阻礙，因為他們不僅得組織起來對抗資方，還必須對抗本地勞工的歧視(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反應。本地工會與移民勞工之間因互不信任而形成的惡性循環，可能為工人階級帶來毀滅性後果(Castells 1975: 60)。

上述種種特殊障礙，形塑了移民政治運動的本質，他們傾向發

動激烈但零星的抗爭(Castells 1975: 59; Petras 1980: 445)。抗爭之所以激烈，可以從移民勞工歷經嚴重剝削的角度來理解，而抗爭之所以零星，大致可歸因於資本強制摧毀長期組織的能力(例如威脅驅逐出境)。當然，移民有時能夠克服這種傾向，形成或參與穩定的政治運動，我們在此只是指出，他們做此努力時，會面臨更大的阻礙。

移民運動的另一樣貌是，移民時常被迫向移民小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靠攏。當然，這種傾向與殖民情況相當類似：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勞工被迫與民族資產階級組成暫時性結盟。由於移民勞工和小資產階級同樣遭受民族壓迫，他們的合作至少在短期之內有其共同利益，即使移民小資產階級也助長剝削移民勞工階級。當然，移民群體出現民族主義運動，會進一步壓抑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可能性，最終受益的可能還是資產階級。

儘管移民勞工面臨種種特殊障礙，他們仍可代表工人階級中最進步、最具階級意識的一群。正如宗主國無產階級陷入一連串妥協之際，第三世界以農民為主的革命卻能開先鋒，重創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移民勞工也可能起而引領基進的社會變革。

## 結論

本文嘗試概述國際勞工遷移背後的若干基本歷程。我們主張，勞工遷移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利潤率下降以及週期性危機。為解決這些問題，需吸收更廉價的新勞動力來源以提高剝削率。在此吸收過程中，無論是國際層次(帝國主義)或國家場域(移民)，最初吸引資本的不均衡發展情況都會愈趨惡化，原因不僅因為資本壓迫殖民勞工至超級剝削的位置，也因殖民中間人和宗主國／壟斷部門勞工的介入活動。對這兩個階級而言，國家發展和階

級鬥爭都因宗主國資本利用殖民勞工而遭到扭曲，這些扭曲便導致國族主義運動(無論在殖民社會或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每每凌駕階級運動之上。整個體系中，不論是在殖民地內或移民，最受壓迫的是遭受超級剝削的殖民勞工。本書研究焦點即鎖定在此種移民勞工的其中一群：美國的亞洲人。

### 參考書目

-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onowitz, Stanley. 1978. "Marx, Braverman,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Insurgent Sociologist* 8 (Fall): 126–46.
- Arrighi, Giovanni. 1978.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ach, Robert L. 1978a. "Mexican Immigration and U.S. Immigration Reforms in the 1960." *Kapitalistate* 7: 63–80.
- Bach, Robert L. 1978b. "Mexic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 Baran, Paul A. and Paul M.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dern Reader.
- Barratt–Brown, Michael. 1972. *Essays on Imperialism*.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sman.
- Bettleheim, Charles. 1970. "Economic Inequalities between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nthly Review* 22 (June): 19–24.
- Blauner, Robert. 1972. *Racial Oppres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luestone, Barry. 1972.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2 (Fall): 65–82.
- Boddy, Raford and James Crotty. 1975.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Spring): 1–19.
- Bonaich, Edna. 1972.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October): 547–59.
- Bonacich, Edna. 1975. "Abolition, the Extension of Slavery, and the Position of Free Blacks: A Study of Split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6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November): 601–28.
- Bonacich, Edna. 1976.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Black/White Rac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plit Labor Market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February):

34–51.

- Bonacich, Edna. 1978. "U.S. Capitalism and Korean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Uppsala.
- Bonacich, Edna. 1979a.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as a Form of Cheap Lab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ouston.
- Bonacich, Edna. 1979b.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plit Labor Market Theory." In Cora B. Marrett (ed.), *Research i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Pp.17–64,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Bonacich, Edna. 1980. "The Creation of Dual Labor Marke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Athens, Georgia.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reman, Jan. 1978, 1979. "Seasonal Migration and Co-operative Capitalism: the Crushing of Cane and Labor by the Sugar Factories of Bardoli, South Gujarat." Parts 1 and 2.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6 (October): 41–70; 6 (January): 168–209.
- Brenner, Robert.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 (July–August): 25–92.
- Burawoy, Michael. 1976.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March): 1050–87.
- Castells, Manuel. 1975.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ggle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the We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5(1): 33–66.
- Castles, Stephen, and Godula Kosack. 1973.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etz, James L. 1979.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 Case Study of Puerto Ric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1 (Winter): 16–32.
- Dobb, Maurice. 1940.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omar, Evsey D. 1970.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March): 18–32.
- Dos Santos, Theotonio.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May): 231–36.
- Edwards, Richard C.,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Gordon(eds). 1975.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 Emmanuel, Arghiri. 1970. "Economic Inequalities between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nthly Review* 22 (June): 13–9.

-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vans, Robert Jr.. 1970. "Some Notes on Coerced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December): 861–66.
- Evansohn, John. 1977. "Workers and Imperialism: Where is the Aristocracy of Labor?" *Insurgent Sociologist* 7 (Spring): 54–63.
- Fanon, Frantz.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 Fernandez, Raul, and Jose Ocampo. 1974.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ot Depende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 30–61.
- Frank, Andre Gunder.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 Andre Gunder.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zier, E. Franklin. 1957. *Race and Culture Contracts in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Freeman, Gary P. 1979. *Immigrant Labor and Racial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French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45–197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urnivall, J. S.. 1956.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eschwender, James A.. 1978. *Racial Stratification in America*. Dubuque, Iowa: Wm. C. Brown.
- Glyn, Andrew, and Bob Sutcliffe. 1971. "The Critical Condition of British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66 (March–April): 3–33.
- Gonzales, Rosalinda M., and Raul A. Fernandez. 1979. "U.S. Imperialism and Migration. The Effects on Mexican Women and Famil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1 (Winter): 12–123.
- Gordon, Davi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Goetz, Andre. 1970. "Immigrant labor." *New Left Review* 61 (May–June): 28–31.
- Harding, Timothy F. 1976. "Dependenc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1 (Fall): 3–11.
- Harris, Marvin. 1964. *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Walker.
- History Task Force, 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nas. 1979.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The Puerto 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Jackson, John Archer. 1963. *The Irish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uper, Leo, and M. G. Smith (eds.). 1969. *Pluralism in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clau, Ernesto. 1971.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67 (May–June): 19–38.
- Lenin, V. I.. 1939.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ldonado–Denis, Manuel. 1980. *The Emigration Dialectic: Puerto Rico and the US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ndel, Ernest. 1970. "The Laws of Uneven Development." *New Left Review* 59 (January–February): 19–40.
- Mao, Tse–Tung. 1967.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2.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Marchant, Alexander. 1966. *From Barter to Slavery*.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 Marx, Karl. 1959. *Capital*. Vol. III.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2.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eillassoux, Claude. 1972.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1 (February): 93–105.
- Nicolaus, Martin. 1970. "The Theory of the Labor Aristocracy." *Monthly Review* 21 (April): 47–56.
- Nikolinakos, Marios. 1975. "Not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Migration in Late Capitalism." *Race and Class* 17 (Summer): 5–17.
-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Omvedt, Gail. 1973. "Towards a Theory of Colonialism." *Insurgent Sociologist* 3 (Spring): 1–24.
- Omvedt, Gail. 1980. "Migration in Colonial India: the Articulation of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by the Colonial Stat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7 (January): 185–212.
- Oppenheimer, Martin. 1974. "The Sub–proletariat: Dark Skins and Dirty Work." *Insurgent Sociologist* 4 (Winter): 7–20.
- Owen, Roger, and Bob Sutcliffe (eds.). 1972.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 Palma, Gabriel. 1978.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f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Under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6 (July–August): 881–924.



- Petras, Elizabeth McLean. 1980.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In Roy Bryce-Laporte (ed.), *Sourcebook on the New Immigration*, Pp. 439–49.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Petras, James F. 1976.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Periphery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8 (Summer): 20–35.
- Portes, Alejandro. 1978a. "Migr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8(1): 1–48.
- Portes, Alejandro. 1978b. "Toward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Illegal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2 (Winter): 469–84.
- Post, Charles. 1982. "The American Road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33 (May–June): 30–51.
- Romagnolo, David J. 1975. "The So-called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 (Spring): 7–32.
- Samora, Julian. 1971. *Los Mojados: the Wetback Sto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Sutcliffe, Bob. 1972. "Conclusion." In Roger Owen and Bo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Pp. 312–30. London: Longman.
- Sweezy, Paul M. 1970.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dern Reader.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67. *Race and Racism*. New York: John Wiley.
- Victorisz, Thomas, and Bennett Harrison. 1973.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Positive Feedback and Divergent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May): 366–76.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5. "Class-formation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5(3): 367–75.
- Ward, Antony. 1975a. "European Capitalism's Reserve Army." *Monthly Review* 27 (November): 17–32.
- Ward, Antony. 1975b. "European Migratory Labor: A Myth of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27 (December): 24–38.
- Weisskopf, Thomas E.. 1978.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Cyclical Crises." In *Crisis Reader Editorial Collective, U.S. Capitalism in Crisis*, Pp. 241–60. New York: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Wilson, Francis. 1972. *Migrant Labor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SPRO-CAS.

- Wolpe, Harold. 1972. "Capitalism and Cheap Labor—power in South Africa: From Segregation to Apartheid."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vember): 425–56.
- Wolpe, Harold. 1975.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South African Case." In Ivar Oxaal, Tony Barnett, and Davi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Pp. 229–5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right, Erik Olin. 1975.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surgent Sociologist* 6 (Fall): 5–39.
- Zolberg, Aristide R. 197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 In William H. McNeill and Ruth S. Adams (eds.), *Patterns and Policies*, Pp.241–8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